

《汉阳门花园》唱哭乡愁

“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过路的看风景，住家的卖清茶……”一曲《汉阳门花园》唱响央视元宵晚会，撩起无数武汉人泪花闪烁，而激起的欢腾全球共享。家乡人重温记忆，外地人抚慰乡愁，武汉继央视春晚之后，再度绽放人文魅力。

《汉阳门花园》不过一首民谣，喃喃细语般的儿时回味，街头巷尾常见的市井风情，却一曲动天下。只能说，正是它浓郁的地域特色，代表了武汉人气质，形成沁人心脾的穿透力，传播出一座城市的音乐视觉形象。

《汉阳门花园》创作者冯翔本是草根歌手，当年很难想像，一首民谣能登大雅之堂。笔者的手机上，早有2021年杭州青年合唱团的版本，汉腔柔软缠绵那么深情，武汉便从东湖走向西湖，飘落于吴侬软语之中。元宵晚会后，武汉星河合唱团的版本又不胫而走，外地人惊讶“武汉话好美好温暖”，颠覆了对“九头鸟”的刻板印象。

这就是人文的力道，这就是音乐的神奇。哪怕岁月无情山川不复，只要哼几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切可以重现。《苹果香》的大列巴烤热了伊犁城，《托托里海的牧羊人》带红了阿勒泰。即便远隔重洋，“一条大河波浪宽”就是祖国，“好一朵茉莉花”就是中华，无论语言多么不同，一下拉近了彼此。

音乐穿越时空，到哪都会遇到知音。各地民谣列入“非遗”项目，就在于它承载风土人情，独具文化价值。冯翔的另一首《夏秋谣》汉味十足，插入一句“三娘娘管金叉”，再来一声“伢呢回来吃饭呐”，哪一个武汉伢不想起妈妈、家家（外婆）或是太（奶奶）？亲情萌动，默默流泪的感觉，真好。

民谣散发熟悉的泥巴气息，总能把从前唤了回来。一首江南小曲《弯弯的月亮》，留恋弯弯的小桥、弯弯的小船和童年的阿娇，可又心中充满惆怅——“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然而，如果今天的村庄不唱过去的歌谣，又去哪儿寄托“弯弯的忧伤”？正像《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所言，“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汉阳门花园》唱出了乡愁，唱出了向往，不会让我们惆怅。它连同《昙华林》《六渡桥》《和平里》《夏秋谣》，点染一卷城市风俗画，把武汉带往远方。

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汉需要发掘地方音乐资源，创作出更多城市歌曲。2019年，中国音乐家协会评选“最美城市音乐名片”，10首最佳歌曲和24首优秀歌曲上榜，遗憾武汉无一入围。听，无锡《太湖美》，哈尔滨《太阳岛上》，厦门《鼓浪屿之歌》，三亚《请到天涯海角来》……哪一首不让人迷上一座城市？

歌喉中的共鸣，耳朵上的流淌，都会最后滋润到心田。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菲 杨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刘海燕

李文洲 李敏娟 张冰峰 张智勇

陈红英 林伟 唐云峰 谭艺琴

潘红莲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章旷怡

编辑：许濛 刘玮

封面设计：王鹏

阅城偶记

<<< <

1 《汉阳门花园》唱哭乡愁 / 简桦

时代年轮

<<< <

4 1985，武汉动物园展新颜 / 尹新秋

风雨同舟

<<< <

11 向绿而行，守护生态青山 / 胡斌

九城同心

<<< <

15 应城膏雕：“膏都盐海”孕育民间艺术瑰宝 / 章旷怡

委员天地

<<< <

20 以歌载情，我把武汉唱给你听

/ 冯翔（口述） 章旷怡（整理）

25 从一盏路灯到万家灯火 / 曹蕊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28 亲历武汉绿地中心建设背后的故事 / 李 煜

烽火江城



33 序战失利（下）：九江战役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三 / 涂文学

人物述林



38 孙中山创立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 / 曹 波
45 雷锋，一张照片的“武汉情缘” / 余 玮

都市寻踪



49 旧江汉关攫取非海关业务特权 / 李笙清
57 武昌“游乐大街”民主路 / 方东平

扫街探疑



61 汉阳泗湾：《革命家庭》的故事发生地 / 侯红志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l@163.com

1985，武汉动物园展新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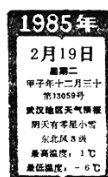
◇ 尹新秋

轮印：1985年2月20日大年初一，武汉动物园建成开放，为全国八大动物园之一。如今，武汉动物园四十不惑，改造升级全新亮相，成为著有特色的湿地生态动物园。

从闹市迁向“云梦泽”

武汉动物园位于汉阳墨水湖与马沧湖之间，占地面积67公顷，“规模化、半自然式”的定位和特点，都表现出来了，因此初期名叫“云梦泽游乐园”。云梦泽是江汉平原古代湖泊群的总称，“云梦泽”三字，状其辽阔，得其自然。

武汉动物园的前身，可追溯到中山公园1953年建立的动物园，但中心城区空间



珍禽异兽园中藏 木划快艇湖上漂

云梦泽游乐园春节正式开园

本报讯 全市人民盼望已久的云梦泽游乐园（即武汉动物园）春节正式开园。昨日，游乐园开放，武汉地区地方和部队的领导同志纷纷来这里检查参观。

湖北古有云梦泽之称，而座落在汉阳墨水湖畔的云梦泽游乐园地势起伏，湖面开阔，景色宜人。恰似云梦泽之缩影，前夜一场大雪，园内银装素裹，更显十分妖娆。顺着大门进去，逐步园中路，跨过圆洞桥，金丝猴、熊猫、河马、中型猛兽、熊类、鹿苑、鸟区、水禽、鹤岛、孔雀等十个展区历历在目，八十多个品种共九百多只（只）动物可清晰地印入游客的眼帘。这里，既有吼声如雷的雄狮猛虎，又有性情温顺的雏儿鸟儿；一九八四年湖南捕捉到一只“毛公”（即短尾猴）曾轰动一时，如今这里竟然也弄到一只，圈养在金丝猴馆内，使游人大大地眼福。

以展出动物为主的这个游乐园，还配备了一些游乐设施。进门处，几辆三轮彩车各具特色，用它可载着游客逛遍全园；湖面上，二十

几只小木划，旅游快艇各有千秋，游客登上便可尽情地观赏湖光山色，饱览园林内外。湖滨处，西望水榭临湖相望；山岗上，几个亭阁相对而立，服务摊点，或排列在大门前，或置放在景点侧；或固定，或活动，为游客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和旅游纪念品。市公用交通管理部门为方便游人，还特意延长和新辟了几条到这里的旅游线路。

市园林局的负责同志高兴地说，到整个游乐园按规划完成时，面积将达到一千七百亩，云梦泽游乐园有四百多种动物，云梦泽游乐园有四百多种动物，云梦泽游乐园有四百多种动物，云梦泽游乐园有四百多种动物，成为一个让游客吃好、喝好、玩好的游乐中心。

（本报记者 柯青）

长江日报传播研究院 出品



1984年，军民奋战一百天共建动物园

狭小市声喧嚣，限制干扰了动物的生长及展出。

1975年，武汉动物园开始筹建，初期投入180万元，建设基础工程和园林绿化，面积为25.9公顷。

1980年，武汉园林技工学校为动物园专门开设动物班。1982年，张邦胜等首批28名学员分配到动物园，他开始养鸟，后来养金丝猴，一直干到三年前退休。

1992年春，我多次去武汉动物园，采访过张邦胜。《同金丝猴朝夕相处的人》一文，发表在当年4月30日《长江日报》“社会纪实”版。时隔32年，2024年12月5日，我带着当年的报纸到动物园，再次见到张邦胜，在桌上摊开文章版面，两人提起往事。

张邦胜回忆，刚分配到动物园，这地方还是一片菜地，大会战的场面那可真大。

1984年10月，武汉空军部队指战员出动12500多人次，会同武汉园林系统的职工，开展“军民共建武汉动物园”大会战，历时一百天，建成环湖路等8项工程。

那时候，全国相继建成动物园或具有一定规模动物展区的综合性公园已达135处。武汉动物园建设加快脚步，列入武汉市“六五规划”和“惠民十件大事”。

1984年，武汉动物园用地扩大到113.3公顷，马沧湖的大小瓜嘴（22.4公顷）也划入。随后两年投资600万元，为前8年的3.5倍，建成饲料房、狮虎山、圆洞桥、桃花林等动物

馆舍、园林景点和服务设施。中山公园的动物50种317只（头）全都调拨过来，又引进亚洲象4头，可谓初具规模。

那时，我的工作单位在五里新村，与动物园隔一条马路。住的地方也不远，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了。儿子1983年出生，两岁赶上动物园开园。儿子大了，有了孙女，带孙女看动物又是市内游的首选。儿孙辈的童年记忆中，都有动物园的欢声笑语。

武汉动物园边开放边建设，熊山、狮虎山、河马馆、大象馆是最早一批馆舍，引进了金丝猴、狮子、老虎、金钱豹、狼、河



1985年，受人欢迎的猴馆

马等动物。1991年10月1日，百鸟乐园开放，为华中首创。1999年，动物园出资800万元，买下汉阳渔场马沧湖（面积26.7公顷）的水面使用权。陆地，水面，空间更加广阔；珍禽，异兽，品种更加丰富。

武汉动物园与国内外动物园开始广泛交往。单是国外，就与日本犬山动物园、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动物园、德国杜伊斯堡动物园结成“友好动物园”，动物大批量互赠互换。克利夫兰动物园1986年赠送黑猩猩、环尾狐猴、金刚鹦鹉、浣熊等4种8只，1990年又赠送金刚鹦鹉、松鼠猴、白头绒猴、红毛猩猩等4种10只。杜伊斯堡动物园1989年赠送斑马1对、河马1只，1994年赠送长颈鹿双胞胎。

武汉动物园是全国八大动物园之一。全盛时期拥有大熊猫、金丝猴、棕熊、斑马、长颈鹿、河马、大象、狮、虎、豹、丹顶鹤、黑鹳、黑天鹅等珍禽异兽300余种3000余只（头）。

“动物明星”神农架金丝猴

武汉动物园的标志，是一只吊臂戏耍的川金丝猴。川金丝猴分布于四川、甘肃、湖北神农架等地，以其缕缕金丝似的柔软长毛而得名，电视剧《西游记》的美猴王就以它为原型，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猴子之一。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贵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濒危一级保护动物。

武汉动物园以发展灵长类尤其是神农架亚种金丝猴种群为特色。金丝猴饲养难，人工饲养条件下繁殖更难，繁殖而成活更是少见。

1986年5月15日，金丝猴“欣欣”出

生，神农架金丝猴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繁殖成功首开纪录。此后，每年都有金丝猴多胎成活，种群鼎盛时期多达21只。中国动物园协会的金丝猴研讨会，选择在武汉动物园召开。

金丝猴“欣欣”繁育成功时，张邦胜的女儿刚出生，他的生活里一下多了两个新生命，但爱的天平偏向金丝猴一边。猴馆旁，有一个5平米的居室，又阴暗又潮湿。张邦胜把妻子、女儿接过来，说是两头兼顾，但他待在猴馆比待在居室要多得多。

“欣欣”断奶时，整天嗷嗷乱叫，张邦胜听出烦躁和寂寞。他说，那是“欣欣”在找妈妈。他把“欣欣”抱进卧室跟他同吃同睡，床上三天两头总有一摊猴屎猴尿。最伤脑筋的是睡不安神。“欣欣”一次睡不了个把小时，醒来就从这头钻到那头。他每晚睡觉要拽住“欣欣”的尾巴或一只腿，但一入睡手就自然松开，“欣欣”又乱钻乱动，把他的被窝当作了天宫。

在张邦胜被窝里睡大的“欣欣”和“贝贝”，从他的温情中体会到人类的友善，常



2012年，饲养员张邦胜与小黑叶猴



金丝猴在日本犬山动物园展出时的海报

常活蹦乱跳与游人牵衣握手嬉闹玩耍。有时爬上树梢，悠哉游哉摘食树叶或敞开肚皮晒太阳，张邦胜一喊，它们立马下来乖乖回到笼中。放养小猴，是武汉动物园的一景。

1985 和 1988 年，金丝猴相继在日本和美国展出引起轰动，在日本犬山的展出尤其成功。日本人特别喜欢金丝猴，从甘肃来的金丝猴同时展出，虽然同属川金丝猴但不是一个分支，没神农架金丝猴漂亮。展方希望神农架金丝猴留下来，留不下来就延长展出，一共三个月。

张邦胜说，这要感谢市里率先办了动物班，比北京、天津等城市要早，学和学大不一样。专业训练用于实践，又上升到理论，他写出《金丝猴的生态营养与繁殖》《金丝猴繁殖生态的初步观察》等 10 多篇论文，惠及兄弟动物园金丝猴的生息繁衍。

金丝猴是“动物明星”，张邦胜是“饲养明星”——武汉市新长征突击手、自学成才优秀职工、劳动模范……多年的新闻人物。一见面，他还是谈他的“育猴经”。猴子重感情，他退休了不时到猴馆转转，养过的猴子都跟他打招呼。他养过的“细细”活到 28 岁，相当于人类的百寿老人。



金丝猴在美国展出时的报道

吉尼斯“百岁寿星”大熊猫

上点年纪的武汉人，应该记得大熊猫“都都”。它是“寿星”，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都都”1962 年 9 月在野外出生，1963 年 6 月在四川南坪捕获，8 月送到成都动物园。1972 年前，武汉没有饲养展出过大熊猫，中山公园动物园与成都动物园协商交换大熊猫，对方提出用一辆武汉产“嘎斯”汽车换一只。市园林局给市政府打报告，政府特批一辆“嘎斯”，换来了“都都”。

大熊猫的自然寿命，野外生存很难见

到20岁以上，人工饲养25岁以上也罕见。1978年后，16岁的“都都”进入老龄，出现消化不良排稀便等综合症状。视力也逐渐减退，一年后从看不清到看不见，两年后因白内障双目失明。好在“都都”听力不错，嗅觉灵敏，熟悉居住环境，还能正常生活。

“都都”多次遭遇死神威胁，一次又一次逢凶化吉。1999年37岁，相当于人类的“百岁寿星”。4月24日这天，动物园邀请关心“都都”的各界人士来园，提前为“都都”庆祝生日。此后不久，“都都”的癫痫病复发，7月22日23时42分停止呼吸。

《长江日报》记者王志远守在抢救现场，时隔25年记忆犹新：“那天晚上接到动物园的电话，匆匆赶过去。救护小组以外，华农的教授也在那里。不久，园林局的詹局长也赶到了。‘都都’很多器官衰竭了，没抢救过来。第二天，我们报纸发了消息。三天后，我们的专版发了一整版，报道抢救17小时的全过程。”

在“都都”离开的前两天，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通知：“都都”申报世界最长寿大熊猫吉尼斯纪录获得批准。

此前，武汉动物园专门向市政府申请100万元资金，设计了一座条件较好的大熊猫馆，可“都都”没有等到建成那一天。“都都”做成一个标本，放在熊猫馆醒目的地方，安慰游客，相伴后继者。

“都都”之外，“春春”“健健”“庆庆”和因地震疏散转移而来的“希望”“伟伟”，先后与武汉动物园结缘。2023年9月，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武林”和“盟盟”，又续写传奇。“庆庆”生育9胎、



大熊猫“都都”37岁生日

产崽13只，号称“英雄母亲”。

走进熊猫馆采访，饲养员付燕说，她爸爸是动物园兽医院院长，小时候喜欢跟爸爸来玩，1999年当上饲养员，2012年开始饲养大熊猫，去大熊猫保护中心学习过三个月。现在，爱熊猫的越来越多。每只大熊猫都有自己的粉丝，不乏外地和外国人。“猫粉”会轮流排班，来熊猫馆拍照片、录视频、做直播，发到“猫粉”群传播。

动物园的“寿星”，还有河马和长臂猿。

河马“大江”1984年5月从南宁引进，是全程陪伴动物园的“元老”。长臂猿“喜喜”，今年42岁，相当于人类100多岁高龄，也是一开园就在这里安居。

长臂猿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世界20种长臂猿，我国只有7种，总数不足2000只。武汉动物园7只长臂猿，3对情侣。“奶奶”级别的“喜喜”一直独身。曾将一只雄长臂猿关进一个笼，可怜的“追求者”被咬伤好几处，缝了十几针。长臂猿择偶十分严苛，不喜欢就绝不将就。为了让“喜喜”安静舒适地度过晚年，特别为它设计了一间不对外展示的“养老院”。

湿地上的生态动物园

1996年4月，我采访武汉动物园后，做了一集电视专题，同时写出《来自武汉动物园的报告》发表在《武汉晚报》，切入点是“认养动物，奉献爱心”。大熊猫、河马、非洲狮、黑熊、斑马、扬子鳄等动物，先后被一些企业认养。德国杜伊斯堡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埃林先生，认养了一只长颈鹿——来自德国杜伊斯堡。埃林每个月去一次动物园，将捐款交到动物园负责人手上，然后与长颈鹿亲切“会晤”。

开展动物认养活动不是武汉首创，上海、天津动物园先行尝试。1995年，上海动物园由社会认养捐资达100万元，天津动物园也有60多万元。

1990年代以来，动物园游客量开始下降，门票收入受到影响。

动物园负责人介绍，由于资金短缺，动物品种和数量好几年没有增加，一头猩猩10万元，一头大象25万元，买不起。即使建造笼舍，也常常是空有计划而难以实施。灵长类动物一直撑着动物园的门面，但它们的笼舍也差好几座。

一只老虎，每天要吃一只活鸡和10多公斤牛羊肉。而且，牛羊肉必须是纯而又纯的精肉，油、筋和血管统统都得去掉。养一只老虎，一年要7万元。狮子、豹子……所有食肉动物都是挑肥拣瘦。熊猫、金丝猴一类杂食动物好伺候一些，但吃的鸡蛋、香蕉、苹果，也样样不便宜。一年的饲料费最少得100万元，加上水电费、笼舍维修费等，一年至少需要1000万元。

一年的游客量不到150万人次，门票成人3元、小孩1.5元，收入约300万元。

加上集资办公司、出租娱乐设施和商业网点的收入200多万元，还要依靠政府补贴220万元，总共也只700多万元，离1000万元还有200多万元缺口。

如今，当我再次以采访者同动物园有关人员交流时，感觉彼此的心情都轻松多了。

虽然，成本在增加——1996年引进一只猩猩10万元，2022年引进两只猩猩330万元。大熊猫不能换也不能买只能租借，一只一年50万元。一只老虎一年的饲料费，由过去7万元翻番到几十万元。

但是，财政拨款增加几倍，门票增幅更大——2020年20元，2023年改造升级后40元。游客量增加到400万人次，20—30岁的年轻人占46%，他们把动物园当成两个园游玩，是动物园，也是公园。

2023年9月28日，武汉动物园改造升级后重新开园。在这个熟悉的地方，我逛出了跟以往不同的感觉。还是那山，还是那水，但笼舍与景观依存、景观与山水相因，呈现出新面貌。以前是三面环水，现在又挖出人工湖天鹅湖，会同墨水湖、马沧湖，把一片绿地围在水中央。这种建在湿地上的动物园，全国并不多见。

说是改造升级，实际上几乎重建。动物不再以类别划分，而是以栖息地划分为五大主题展区：非洲区、亚洲区、美洲区、大洋洲区和湿地鸟区。灵长类动物以前都在一个展馆里，现在按栖息地划分后，非洲的黑猩猩、黑白疣猴、环尾狐猴等住在茂密的刚果雨林区，跟生活在草原的非洲象、长颈鹿等老乡做了邻居；亚洲的金丝猴、黑叶猴、长臂猿等住在山林王国，毗邻大熊猫、小熊猫那片竹海。在场馆设计上，尽量模仿原属地风貌，澳洲区重点营造袋鼠喜欢的草地、沙地，刚果雨林区则是高大茂密的森林……

这些选择使用大量乡土植物，尽最大可能还原生态环境。

动物馆舍扩大了5倍，过去在园区面积中只占10%左右，现在占到50%。内笼、外笼，展示区、非展示区，花草、竹树、假山、池水、岩石，以至“健身器材”“游乐设施”……替动物能想到的都想到了。

专门设置的非展示区，是动物的私属活动空间，如果烦了、病了、老了或需要交配，可以不被打扰。一位老饲养员感触良深：“以前馆舍小，太阳晒起来动物都没地方躲。现在园子是真好！”

这次采访，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栈道多了，曲折蜿蜒层层叠叠，如高空走廊。俯瞰，仰望，平视，“左顾右盼”，视角多了，视觉体验也丰富了。

动物园现有动物138种、1100余只(头)，分散在偌大园区，或在假山草坪负暄闲坐，或在林间墙下漫步，或在草丛岩间戏耍……活动空间大了，亲近自然，就和我们保持了距离。

2005年，世界动物园——水族馆协会发布了新版《世界动物园与水族馆的保护策略》，强调“为野生动物创建未来”，把动物园的职能调整为“综合保护和保护教育”。

武汉动物园科普宣教部部长邓丽玲说，像华南虎，在野外生存的灭绝了，我们动物园还有，其他几个动物园也有。大熊猫，朱鹮保护得比较成功。“保护教育”还得前移，准备请一些院士来开讲座，开一些青少年研学课程。还要组织一些志愿者到学校、社区去宣讲，让大家知道如何同动物友好相处。



武汉动物园鸟瞰图

动物园的职能，一直跟着社会发展在变。早先的私人动物园，主要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权贵彰显权力；后来的公众动物园，侧重娱乐游赏。现在，顺应现代动物园的新理念、新趋势，朝着“生态动物园”目标努力，更加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展示、繁育、科研和科普，让游客在参观体验中，将关注点从圈养野生动物延伸到大自然，更多地了解人与动物、环境的各种关系，实现生态的平衡。

从中山公园动物园的铁笼，到墨水湖畔的半自然环境，再到今天改造升级后的“仿真生态”，武汉动物园四十不惑，更加懂得人和动物的相互依存。我想，这不只是动物的福音，也会启发人们对于生态文明的深度思考。

尹新秋，武汉电视台高级编辑、原海外专题部主任

向绿而行，守护生态青山

◇ 胡 斌

人物名片：胡斌，农工党青山区工委主委，青山区政协委员，青山区水务和湖泊局排水泵站高级工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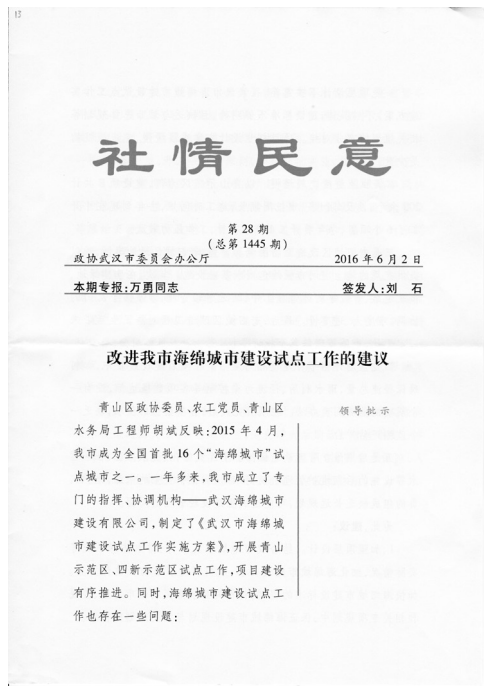
一抹乡情，一份寄托。我是农工党党员，美丽乡村寄托着我深厚的情感，绿水青山蕴含着美好的愿景。

碧水保卫战为美丽青山护“颜值”

为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详细了解青山区生态环保工作的实施情况及基层区域生态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青山区政协组织全体委员走访调研，全面掌握区域动

态，主动建言献策，在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生态环保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下，全区坚决扛牢湖泊保护的政治责任，严守水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抓好湖泊保护治理的各项工作。这也成为我持续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始终致力于水务和湖泊环境治理的重要契机。

2012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一则“要沙湖不要杀湖”的警示报道引起了我的关注，我意识到湖泊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性，通过查找各类资料，结合辖区湖泊情况，撰写了“应加大对北湖和严西湖的湖泊保护力度”的社情民意并被市政协所采用。次年，在北湖和严西湖案例基础上，



胡斌海绵城市建议专报

我撰写的农工党青山区工委的集体提案“关于加大青山区湖泊保护力度的建议”得到采纳。

2017年，我市党代会报告提出，要以防洪、排涝、治污、保供水为重点，大力推进“四水共治”。各区相继打响“治水战”，我也积极响应号召，聚焦防洪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城区污水收集处理、供水管网改造四个方面，加强对“四水共治”工作的调研。在区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我代表区政协城建组就“关于切实做好‘四水共治’工作的建议”作了发言。

水源地保护与供水安全息息相关，2018—2019年，我持续关注北湖问题，多次参与区政协关于北湖发展的调研。基于对北湖水环境的了解，我在2018年常委协商会上作了“关于加大北湖水环境治理的建议”发言。2019年，我参与区政协关于“碧水保卫战”的调研，针对性提出了“关于青

山区黑臭水体和劣五类水体治理的建议”，并在同年常委协商会上作为代表发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湖泊及水体的保护越来越受重视。近年来，区政协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工作提升；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增强湖泊保护和治理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

青山区坚持水环境综合治理，加强各部门联动配合，压实河湖长责任，加强河湖管控，推进“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遏制增量、清除存量，逐步形成长效管控机制。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我区生态环保工作，尤其是水资源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有力保障了全区广大居民的生活福祉，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海绵化改造让青山“会呼吸”

2012年12月，我有幸成为一名政协委员，肩负着委员与农工党员的双重使命与职责。我深刻认识到，必须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切实发挥建言献策的履职实效。

2012年，作为区政协城建组的一员，我积极参加调研，形成“关于加快推进青山滨江生态商务区建设的建议”，作为那年政协全会的一号大会发言。2013年，我继续研究青山区滨江生态商务区建设，更进一步形成“关于加强滨江区域堤防江滩综合整治工程建设管理的建议”，同年9月，在区政协九届会议常委会上作大会发言。时隔四年，青山江滩获C40世界城市奖“城市的未来”奖。再次迈上青山江滩的绿色跑道，心中更是无限感慨，也感到无比光荣。



北湖水环境治理调研

2016年，我参与区政协组织的“武汉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题调研，多次前往市海绵公司、青山区海绵城市试点工地等实地调研，取得一手资料。所谓海绵城市，即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将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让城市像海绵一样拥有适应环境变化的“弹性”。得益于在水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我有幸参与撰写了“关于做好武汉海绵城市建设的建议”，这项建议被编入区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的大会发言材料，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该材料还被市政协“海绵城市”专题协商所采用。

在区政协倡导下，“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已深入青山区市政建设的方方面面。原来的“低洼地”钢城二中蜕变为“最美校园”，粉煤灰填埋场戴家湖公园涅槃成一座综合性生态公园，武汉首个“会呼吸”的江滩也正

式亮相……海绵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让“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愿景得以实现。

呼应“民声”托起群众幸福大事

做政协和党派工作，就是要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反映情况，多出主意、出好主意，发挥好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把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愿望诉求反映上来，把党委政府的惠民政策宣传下去。

2012年，关注到青山区东部地区的交通出行问题，我撰写了“关于加强青山区东部地区公共交通的建议”，这件关乎居民日常出行的社情民意，也被市政协采用。

中小学教育作为学生成长学习的必经阶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013年，在前往青山区中小学调研时，我关注到学生的课桌椅出现了老化破损，亟须更新升级。为此，我撰写了“关于青山区中小学教学设施的问



在农工党之家开展河湖保护宣讲

题”提案，受到区教育局重视，青山区中小学的教学设施逐步提档升级。

同年，我撰写的社情民意“落实校园卫生监督，保证学生健康成长”被市政协采用。保障校园教学质量的同时，我也注意到儿童口腔健康问题，2013年，我提出“关于对青山区适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的建议”，得到了卫健委高度重视。2017年，青山区已全面实行适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

青山区作为武汉市的老城区，存在许多老旧小区，环境问题尤为严重。2015年，针对“垃圾围城”现象，我提出“关于加强青山区垃圾分类问题的建议”，区城管委积极回复，同年已有试点小区开始实行垃圾分类。2019年，上海正式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引起社会热议，也让武汉市民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如今走近小区，看到的不是“垃圾山”，而是一个又一个分类垃圾桶，武汉的垃圾分类投放正逐步走向正轨。

2016年我撰写“关于提升老旧社区生活品质，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建议”，受青山区条件限制，没有立案，但还是引起了重视。时隔两年，2018年10月，武汉正式发布《市人民政府关于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的意见》，让老旧小区增设电梯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017年，我参与农工党青山区工委赴青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研食药安全问题，形成集体提案“关于加强青山区食药监管队伍建设的建议”。

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与群众诉求，



中小学生学习心理健康问题调研

我撰写关于交通安全、学生教育、农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建议，都得到区有关职能部门的积极回复和办理。这让我感受到，代表群众发声，为群众的利益代言是我们的重要职责，在倾听群众声音的过程中，要对他们反映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找出问题症结所在，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建议。

应城膏雕：“膏都盐海”孕育民间艺术瑰宝

◇ 章旷怡

在湖北省应城市的膏盐矿脉深处，蕴藏着一种冰肌玉骨的矿物，被称之为“蒲阳玉”。它历经千万年地质变迁，凝结为晶莹剔透的石膏矿石，被当地匠人雕成枕、塑成兽、刻成画，最终化作一座城市的精神图腾。

四百多年前，应城大地的崩崖声惊醒了沉睡的矿脉；四百多年后，膏雕匠人的凿刀声仍在回响，诉说着一段关于坚守与创新的传奇。作为“膏都盐海”孕育出的民间绝技，应城膏雕不仅是中华匠艺长河中的一脉清流，更在省级传承人伍柏林的手中绽放出新的光芒。

百年积淀：蒲阳玉脉与膏雕起源

应城，盛产石膏与盐，素有“膏都盐海”之美誉。这片土地与石膏的渊源，最早可追

溯至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据《湖北通志》记载：嘉靖年间，应城西北团山因崩崖而现石膏矿脉，其“光莹细腻，较胜他处”，自此开启了石膏开采的序幕。至清代产业更盛，清光绪《应城志》载：石膏“贩运汉皋（今汉口），收取其税”，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

清末民初，应城石膏已名扬四海。日本学者在《耐火材料之研究》（1926）中称日本“输入石膏，以中国湖北应城为最”。汉口更曾发行石膏股票，足见其商业价值。至此，石膏开采渐成规模，应城初具“膏都”雏形。

“蒲阳玉”之名源于应城别名“蒲阳”。其石膏质地细腻，晶莹冰洁，视之澈明如玉，触之凉爽宜人。色泽以玉白为主，亦有珊瑚红、翡翠绿、象牙黄以及天空蓝等天然色泽。



伍柏林制作膏雕

其纹理呈纤维状或几何结晶状，属石膏矿石中的上乘佳品。这类矿石比较稀少，不太容易找到。

特殊的石膏材质促进了应城民间膏雕工艺的兴起。明万历年间（1572—1620），应城膏雕工艺初兴，匠人将纤维石膏雕刻成神像、砚台，经汉水商道远销湖广，形成“一船膏雕半船粮”的商贸盛景。

石膏有着特殊的药用价值。据《本草纲目》记载：“主治中风寒热，心下逆气惊喘，口干舌焦，腹中坚痛；除时气头痛身热，三焦大热，皮肤热，肠胃中结气，解肌发汗，止消渴烦逆，腹胀暴气，喘息咽热。”故常被当地匠人制作成枕头，起安眠养神之效。

康熙年间，一桩“贡枕”轶事让应城膏雕声名鹊起。湖北官员李纪可访民间，偶见农人枕石膏而眠，称其“消内热，安神志”。他命匠人将石膏雕为方枕，饰以云纹，进献宫廷。康熙枕后酣眠，赐名“酣睡石”，并题诗赞曰：“寒石如玉枕，一觉到天明。”自此，膏枕成贡品，民间效仿成风。

光绪年间《应城志》载：“膏关征税，岁入白银千两。”石膏产业初具规模，为膏雕工艺的成熟奠定基础。但此时膏雕尚属雏

形，匠人多以凿、锉粗加工，器物造型朴拙，作品以实用为主。

随着膏雕技艺的传承与扩散，应城涌现出了一批颇有名望的膏雕艺人。清中后期，应城城关出现专职膏雕艺人——木雕名匠郝长林，人称“郝木匠”，他见石膏质地类木，遂以木雕技法试雕，创制出首件艺术性膏雕——双狮枕。狮头威猛，鬃毛层叠，枕身刻“高枕无忧”四字，一时轰动城关。郝木匠授徒郑彩如、万双明、伍耀生，膏雕技艺始成体系。

经几代匠人的传承和发展，应城膏雕主要形成两大类：实用型和观赏型。前者有枕头、坐垫、靠背及笔架、镇纸等文房用具；后者有十二生肖，有寓意吉祥的龙凤、狮子、貔貅、麒麟、雄鹰、骏马、熊猫，有观音、罗汉、寿星等摆件，亦有浮雕壁画等。

世纪传承：伍柏林的工匠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应城膏矿作为重要战略资源被纳入国家统筹。1950年，湖北省应城石膏矿（“省膏矿”）在龚河村开建，1952年1月投产。国营矿厂引入机械化开采技术，石膏产量倍增，但工艺雕刻仍为传统手工。

伍柏林1949年生于应城龚河村。其父伍耀生曾师从“郝木匠”，是应城膏雕第三代传人。因为精通膏雕，伍耀生被聘为矿厂技师，专司膏雕品质检。他提出“选料四法”——观色、察纹、听声、试刀，成为膏雕选料标准。

龚河村毗邻石膏矿，幼年的伍柏林目之所及，皆是矿车往来、膏石垒垒。父亲作坊中的边角料，成了他儿时的玩具。他常蹲在墙角，以废石膏雕刻小马、小狗，虽粗拙

却形神初具。十二岁时，伍柏林捏制一尊泥塑半身像，乡邻惊叹栩栩如生。父亲见他也喜欢这一行，闲时会传授他一些雕刻技法。

然而命运多舛，16岁那年，父亲猝然病逝，伍柏林只能辍学务农，照料失明的母亲与年幼的妹妹。白天干农活，夜晚雕石膏，他将对父亲的思念刻入石膏中。1979年，村办粉笔厂招工，他因略通绘画入选。粉笔厂与石膏矿往来密切，他借机研习石膏纹理，又常至膏矿图书馆借书学习。对膏雕技艺的喜爱，使伍柏林在工作之余有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5年后，村办粉笔厂停办。所幸伍柏林平日“蓄了”一技之长，他常到邻近乡里帮供销社画广告画，有时也应人之请雕刻膏枕。对藏于民间的膏雕品，他多方搜猎，观摩学习。如此累积，使他的膏雕技艺大有长进。后来“省膏矿”石膏工艺厂聘请他为技术指导，负责带徒生产膏雕、膏塑工艺品。

1990年5月，石膏工艺厂召开美术研讨会，提出开发膏雕产品的设想：用质地较硬的纤维石膏细理石进行工艺雕刻。

细理石雕刻首先在于选材。时逢湖北省首届三峡艺术节正在筹备，需以石膏雕吉祥物“中华鲟”。伍柏林遍寻矿厂选材，偶见一块垫脚白膏，经过冲洗发现是块质地很好的细理石。最为绝妙的是，材料中有一点黑色的“眉毛夹”，这一点“青眉”瑕疵恰如鱼目。他依势雕琢，瑕疵化睛，波纹成浪，一条腾跃的中华鲟浑然天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伍柏林的高超技艺相结合，成就一件绝妙的艺术珍品。

同年11月，膏雕“中华鲟”运送至宜昌，引起多方关注，有人欲出高价购买。省领导及有关部门不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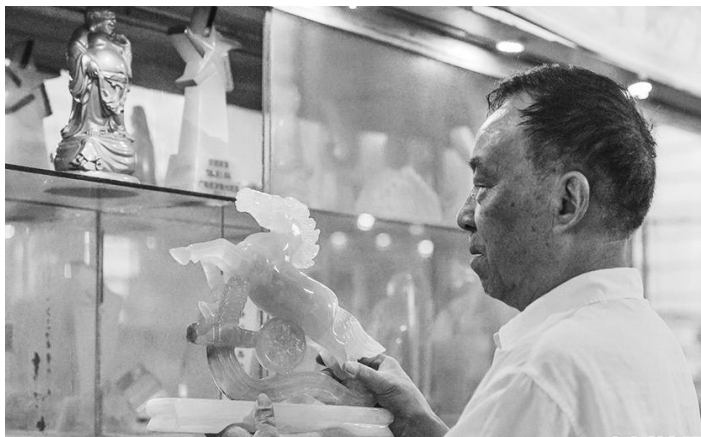
出售，要求作为藏品永久陈列。膏雕“中华鲟”还被台湾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摄制组看中，专程拍摄了15分钟。

墙里开花墙外香，伍柏林的膏雕技艺引起应城市领导重视。恰好石膏产品深加工已被列入发展规划，市里决定创办应城市工艺膏雕厂，由伍柏林担任厂长。

1992年，第二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在孝感地区举行，应城设有分会场。为了抓住这一机会，突出“膏都盐海迎嘉宾”主题，伍柏林带领员工加班加点，为农运会雕刻了一幅18平方米的石膏浮雕壁画，又精制了吉祥物、会徽、穿屏、镇纸等近千件膏雕工艺品。同年6月20日，央视以《应城石膏雕刻闯出新路，为农运会制出工艺精品》为题，向海内外介绍膏雕艺人伍柏林，及其以天然石膏雕镂而成的玉器般的工艺品，扩大了应城膏雕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伍柏林为办好工艺膏雕厂，在继承传统膏雕工艺的同时，从技术、题材等多方面大胆创新。产品投放市场后就广受青睐与好评，各方订购者蜂拥而至。应城市政府授予他“膏都希望之星”荣誉称号，他还被推选为政协委员。

如今伍柏林已年逾七旬，仍每日坚持



伍柏林与其膏雕作品

工作。厂院东墙挂满照片：1979年粉笔厂青工合影、1992年农运会创作团队、2010年首件盐雕试制品……述说着五十载匠心流转的轨迹。

技艺革新：传统工艺的突破与坚守

应城膏雕的雕刻过程，可以用“一锯、二打、三锉、四雕、五磨”进行概括，具体工艺细节则更为复杂。

一、在图纸上设计出图样。二、挑选石膏矿石为原料，分类、分级分别存放。选料口诀：一拱就杂；二不平不均；三侧光看纹；四抹水定色。三、按设计图纸直接做样或泥塑标准模型。四、采用手工锯坯，注意避开不易精雕的局限，下料基准要平整，斜面标准不能误，必须标尺标正，用曲线切割锯坯，如做小件以母样对照，做大件用点线仪定位。五、采用小手动机械粗雕毛坯。六、采用手工精雕细刻。最后，采用手工和现代工具，经细磨、水磨、清洗、晾干、抛光处理，就成为了一件膏雕工艺品。

在继承传统膏雕技艺的基础上，伍柏林不断进行创新。上世纪90年代，他潜心研究用树脂法改“单体”雕刻法为“双层”雕刻法，解决了原先膏雕作品表现力不强的问题，作品更具立体感。研制的“咬磁石膏保健枕”系列产品获三项国家专利。

其后，伍柏林又就地取材成功研制出另一新品种——盐雕，将砂盐制成盐结晶再用玉雕用的金刚钻雕出花纹，呈现出另一种美。长期以来，伍柏林共设计制造出工艺膏雕产品400余种，分医疗保健类、工艺摆件类、装饰装潢类和器皿类等四大类。

除了亲自雕刻作品，伍柏林还心系着另外一事情，那就是授徒传艺。曾有一个

时期，他把这件事看得比雕刻本身还重要，希望这门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然而学习膏雕本身是一件苦差事，工艺流程复杂，工序繁琐细腻，技术性强，耗时长，赚钱慢。再加上工作环境不好，整天与粉尘、噪音打交道，愿意来学习的年轻人并不多。

伍柏林经过深思熟虑，总结出“速成法”教学方式，理论结合实践，易学易懂，易记易操作，使培训时间大大缩短，培训效果明显增强。除免费培训外，他还给予生活补贴，来学习的学员逐渐增多。几年来，从他这里已走出膏雕人才500余人，有的在南方打工，有的自己创业。膏雕队伍逐渐壮大，他的努力初见成效。

进入新世纪，由于机械化制造与模具化生产的冲击，加之石膏原材料价格逐年增高，膏雕工艺流程长、工时成本高，应城从事手工膏雕的企业，从以前的数十家只剩下七八家，而且大都只做模具化批量生产的膏枕，手工膏雕越来越少。

伍柏林的膏雕厂也曾面临生存困境：大单不敢接，小单利润少。有生意的时候厂里员工达二三十人，生意不好时又留不住人。最艰难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守在厂里。可是，伍柏林没有放弃。他先后购进切割机、打磨机等，在切坯、打磨等工序，采用机械操作；但在雕刻这一关键环节，仍坚持采用手工。这样一来，既节省劳力，又不影响工艺质量，大大提高了效益。

后来，厂里又购进了两台数控机床，采用机械加工定型、后期技术处理的方法，将电脑的精确控制与人工的精雕细琢相结合，使膏雕工艺品制作工期缩短、生产能力提升，工艺造型形象逼真、质量不断提高，有效满足了市场需求。

为了更好地传承膏雕技艺，2009年，

伍柏林喊回了在北京工作的儿子伍应超，希望这位电商专业毕业的80后年轻人，能给自己的老手艺带来新气象。购进数控机床与引进高端技术，就是伍应超给出的建议。

伍应超回到厂里后，一方面将传统工艺推陈出新，与现代实用装饰相结合，使膏雕工艺品更贴近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注册网店，将自家产品图片挂上去，一下子引来几家外贸公司，找他们定做出口的石膏枕、烛台、罗马柱，让膏雕不仅走出应城，还走出了国门。

目前，应城膏雕已经过四五代匠人的传承。2011年，“应城膏雕技艺”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伍柏林成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儿子伍应超也已接班掌门，为膏雕非遗市级传承人。

伍应超充分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开发出“非遗盲盒”，内含微缩青枕、刻刀工具包，让青少年体验雕膏之趣；还与故宫合作推出“酣睡石”系列，将膏雕与智能睡眠监测结合，使古老工艺焕发出科技之光。

未来之路：非遗保护的传承之光

应城膏雕经历百年风风雨雨，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科技价值，塑造了应城独具特色的膏雕文化。应城以膏雕为题材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摄影、绘画等艺术作品数不胜数，呈现出应城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折射出应城人独特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观念。

为了让应城膏雕在传承中得到保护，在发展中得以壮大，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



伍柏林与其子伍应超

实施对应城膏雕技艺的保护和传承。

一是保护身怀绝技的膏雕老艺人，发挥他们的“传帮带”作用，做好年轻一代的传承工作。2009年，在应城市首届十大文化名人和优秀民间艺人评选活动中，膏雕传承人伍柏林荣获“优秀民间艺人”的称号。

二是发展壮大膏雕艺术协会组织，保存一套完整的用文字、图片、影像记录的膏雕传统制作技艺。

三是成功申报应城市为“湖北省石膏艺术之乡”，从而助推膏雕行业的规模发展。

四是依托“应城国家矿山公园”文化产业项目，建设一座膏盐博物馆，使传统膏雕技艺成为应城膏盐文化中画龙点睛的瑰宝。

回望百年，应城膏雕始终在变与不变中前行。变的是技法与形式，不变的是蒲阳玉的冰肌玉骨，是匠人“以手传心”的执着。寒石冷，匠心热。应城膏雕，正如其材，于冷峻中蕴藏生机，在时光中静待新生。

章旷怡，本刊编辑

以歌载情，我把武汉唱给你听

◇ 冯翔（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冯翔，市政协委员，知名音乐人，武汉音乐协会城市音乐艺术委员会主任。

小时候的民主路有得那多人 / 外地人
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 / 汉阳门的轮渡可
以坐船去汉口 / 汉阳门的花园 / 属于我们这
些住家的人 / 冬天腊梅花 / 夏天石榴花……

今年央视元宵晚会上，这首《汉阳门花园》又重新唤醒了許多武汉人的记忆。这是我2014年创作的民谣歌曲，当时就发现，这些地名用武汉话唱出来，有独到的韵味，真好听。之后又创作了《六渡桥》《东湖》《昙华林》《归元》，试图拼出一张“武汉音乐地图”，展现武汉人的真实生活。

文化的传承，终究要扎根生活。就像汉阳门花园的石榴花年复一年盛开，我希望用音乐留住武汉的温度，让一代又一代人都能在旋律中找到归属。

藕汤飘香，长江水畔的童年

我外公是在武汉出生的。在那之前，外公的爸爸、爷爷从江苏来武汉，在汉阳门这边安了家，因为这里靠近江边码头，生意好做。武汉沦陷时，全家逃往宜都，外婆挺着大肚子生下母亲。抗战胜利后，他们重返汉阳门，在长江边扎下根。

我从小就在长江边长大，夏天常去江里游泳，大人不让，能在水里泡一下都是好



老汉阳门和现在的汉阳门花园

的。我们那一代人放学回家后，书包随便一扔，一转身就跑出家玩去了。街上都是孩子，成群结队在一起玩耍，有打弹珠、打撇撇、搨拱子、扔沙包等好多游戏。到饭点，屋里人喊了，都赶紧往回跑，贪玩的要等屋里人拿棍子来捉。

现在的民主路是武汉有名的街区，游客来来往往很是热闹。我小时候的民主路，住家的多。民主路一直走到江边，就到了汉阳门。街坊邻居打招呼都带着“弯管子”音：“七饭冇？”（吃饭没？），“克哪里撒？”（去哪儿啊？）这些调子钻进耳朵，成了我最早的方言启蒙。

家家（武汉话“外婆”）在民主路靠江边的口子那卖花红茶，小杯2分，大杯5分。她煨的花红茶用铫子熬得黢黑，吆喝声拖着武昌腔的尾音：“喝花红茶嘞——”那声“嘞”字拐三个弯，像蜻蜓点水。家家是最疼我的人，只要我去看她，不管在做什么事她都会放下，先把排骨藕汤煨了；夏天没有藕，就煨海带汤。花红茶和藕汤的香味至今还在我的记忆中萦绕。

家里最先种下音乐种子的是母亲，她能歌善舞，还会画工笔花鸟画，我从小跟着耳濡目染。父亲和外公喜欢听京剧，我从三四岁就能跟着唱，8个样板戏听来听去，经常一唱就是一整段。少年时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想做音乐、想当诗人、当文学家，却不知如何去实现这些东西。读大学填志愿，在家人的建议下，选择了当时“看起来更正确的一条道路”——学医。

1981年，我考入同济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学临床医学。五年后毕业，去武汉市精神病院报到，成了一名精神科医生。如今回想，这段学医的经历尤为可贵，它让我对生命的真谛看得更真切。人，不管是什么肤色、种族、性别，一旦上了手术台，对医生而言就是一具肉体，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当了医生，但音乐这块我也从没放下。当时武汉冒出第一家“酒吧”——不过是路边支的一个小摊子。我抱着吉他在上面唱歌，唱的时候围一圈人，唱完“呼啦”一声都跑了，没人坐下来消费。再加上是露天，



2025 央视元宵晚会，冯翔与周传雄合唱《汉阳门花园》

刮风下雨都搞不上，没支撑多久就垮了。

一边当精神科大夫，一边唱歌，我没觉得有冲突，在我心里音乐和医术一样，都是缝合伤口的手术刀。不过脑子里面却常常闪过一个画面，多年后，我变成一坐门诊的秃头老教授，感到有点恐惧。直到我真正决定跑去北京做音乐，这种恐惧才消失。

北漂十年，舌尖上的乡愁

2005 年，我揣着吉他北漂，想离音乐更近些。在北京，我做过音乐网站总监，策划过音乐节，甚至给话剧写配乐。这段时间其实给我特别多有益的收获，比如跟爵士乐音乐家、电影编剧、音乐剧制作人都有过交流，让我在艺术上有新的思考，但内心想做的音乐还是没做成。

高楼大厦的缝隙里，我总梦见汉阳门花园的腊梅香。2012 年冬天，我在北京通州租的房子楼下闻到菜梗子炒肉丝的味儿——那是我小时候最爱的“现菜”，开水泡饭能吃两大碗。那一下子，我像是突然被

掏空了，回家就到处买竹叶菜、买青椒、买肉，可怎么也炒不出记忆里的味道。这种舌尖上的乡愁，始终在脑海里盘旋。

直到一次民歌采风的经历，让我逐渐找到创作方向。在云南寨子里，六十多岁的老支书蹲着拉胡琴、唱敬酒歌，调子拐得像山涧溪流。我问翻译歌词，他说：“客人啊，我家今年的新米最香，全煮给你吃。”那一刻我突然懂了：最好的音乐不是编

出来的，是从土里生长出来的。2014 年，我从北京回到武汉。回武汉那天，飞机掠过长江，江面碎金闪烁。我趴在舷窗上，听见心里有个声音说：“该用武汉话写歌了。”

第一首《汉阳门花园》诞生在 2014 年冬夜。暖气片嗡嗡响，女儿在小床酣睡，我想起小时候的汉阳门花园是块空地，上面有好多石榴树；家家的名字叫素梅，就是腊梅的意思，这时她已去世十多年。无数的情感从喉咙中涌出，随口哼出“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两句词，这首曲子就这样出世了。

《六渡桥》写的是我高中暗恋的姑娘。毕业那天递出情书后，竟被她父母请到家中用饭，全程都在聊志愿填报和姑娘的复读计划。直到她送我出门，才在夏夜里轻声说：“现在不想考虑恋爱的事。”答案昭然若揭，失落却混着暖意。多年后我留在武汉学医，她远赴海外，从此杳无音讯。可那晚被妥善珍藏的温柔，永远封存在江城的晚风里。

我在《凌波门》里唱，“花开了满树，花落了无痕，赏花的不看花，看人的不见人”，唱到了春天，和我找不见了的人。上

世纪80年代，我经常往武大跑。一个春夜，我在校园会完朋友，一个人走在那条樱花路，路灯照耀下，突然一阵骤雨，樱花“嗖嗖”掉落，片刻铺满一地。我呆立在那里，心想，这季樱花就是这样了。后来就再也没见过更美的樱花。现在回想常去武大的那十年，也像来了一场雨，逝者不可追忆。

用武汉话写歌，我想过很多年。方言写歌最难的是“调子跟着话音走”。武汉话硬，像热干面里的萝卜丁，嚼着脆生。有人劝我改普通话，传播广；可有些情感，用普通话写出来就会变味。方言是母语，传达情感不需拐弯，不用再翻译一层。一件事情，放在方言里说，才完整。

疫情日记里，长出一座花园

《汉阳门花园》这首方言小调最初只在小范围内传播，谁也没有想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它在网络上被人们频繁翻唱，引发大量转发。方言蕴含的情感力量，在这一特殊时期带给人们慰藉，成了许多武汉人的精神“藕汤”。

那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抱着手机，窝在沙发上，眉头紧锁，看网上的新闻，说人手不够、物资不足，每看一条新闻就感到难过，恨不能做些什么。眼看当年医学院的同学都奋战在一线，真的会内疚。当时如果没有离开这个行业，此时此刻起码还能分担一些。

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是我大学同班同学，他得了渐冻症，还连续那么多天一直坚守在医院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仅有的两次回家，是因为他爱人感染上了新冠肺炎。看着

他一瘸一拐去医院工作的场景，我太难过了，这种难过既为自己，也为武汉的每个人，尤其为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我把这些情感都写入了《老张》这首歌，“老张，你还好吗/现在可以睡觉了吗/挂念你/总想伸个手，帮个忙……”，以此向医护人员们致敬。

只要当过一天医生，一辈子都会想去行使那种职责。我琢磨自己还是可以做点事的，唱点安静、好听的歌给大家听，让听众听完可以安心睡觉。音乐有时传达的是种场景，听者产生联想，就能安静下来。我就在网上开直播，来听的人也不太多，百八十人，多的时候二三百。

早年武汉精神病医院的同事找到我，邀请我讲公开课，听众里有医生护士，也有患者。我得到一些不错的反馈，其中有一位听友，跟我是微信好友，他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听完以后突然给我转账，说是付给我治疗费，因为“那么长时间来，第一次觉得真正放松下来，然后好好哭了一场”。

音乐起到疗愈的作用，起码能让人放松下来，这就够了。我自己也慢慢不再那么消沉，唱歌给别人听，对我来说也是种自我救赎。



冯翔

唱响民歌，留住武汉记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民歌、方言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于我而言，音乐不仅是旋律的流淌，更是土地与语言交织出的生命痕迹。

民歌的根脉深扎在方言里。无论是陕北的信天游，还是江汉平原的小调，它们的旋律走向、节奏起伏，都深深植根于当地的语音语调。比如武汉话的硬朗与直率，天然适合表达市井生活的烟火气。用武汉话写歌，对我来说是本能的选择。方言承载着最温暖的记忆，比如童年时家家煨的藕汤、汉阳门花园的腊梅香，这些细节用普通话表达，总像隔了一层纱。而方言能瞬间把人拉回具体的生活场景，让情感毫无保留地倾泻。方言的抑扬顿挫，本身就是旋律的一部分。

有次省政协在恩施采风，他们回来告诉我一个故事，至今让我刺痛。当地文化馆推荐了一位山歌唱得极好的大姐，大家本想听她唱山歌，她却兴奋地说：“我给你们唱一首《心太软》！”在场音乐家面面相觑，她却坚持唱完流行歌才肯开口唱山歌。这件事让我五味杂陈，当人们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够高级”时，会本能地向“主流”靠拢。但这些都会无形之中泯灭掉十分珍贵的东西——语言的多样性，亦或可以直接称之为文化的多样性。

这件事让我更坚定了一个信念：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不能靠“拯救”，而要靠“激活”。民歌需要找到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这些年，我牵头做起“武汉音乐地图”和“湖北音乐地图”项目，鼓励更多人用方言记录生活。

我常对年轻人说：“别把方言当包袱，它是你独一无二的创作工具。”在黄冈，我曾把方言俗语“这边落雨，那边不落雨”即兴编成旋律，台下听众惊叹“原来土话也能这么美”。在黄陂，我尝试教当地人用家乡话唱古诗，发现只需稍加引导，方言的韵律就能自然流淌成歌。方言的美，在于它真实的力量。只要我们愿意正视它、珍视它，每一句乡音都能成为打动人心的诗。

我的计划很简单：继续写武汉的歌，写汉阳门、六渡桥、黎黄陂路，也写那些没有名字的小巷和菜场。同时，我希望搭建平台，让湖北各地的民间音乐人有机会发声。无论是恩施的山歌、宜昌的船工号子，还是黄陂的田埂小调，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我也深知，语言的发展是流动的，并非一成不变。我们现在讲的武汉话，跟我外公外婆当年说的都存在很多差别。武汉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以前从汉口这边看武昌还能看到天际线，现在连日出也看不到，肯定是有遗憾。但现在长江两岸的夜景也非常漂亮，游轮化作流动的霓虹，吸引着八方来客。

所以不是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就应该多么地缅怀它，只是有些特别珍贵的东西，我们得记住它。包括我写汉阳门的景象、六渡桥的民众乐园，是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来，也能在我们孩子的记忆里留下来。

从一盏路灯到万家灯火

◇ 曹蕊

人物名片：曹蕊，江夏区政协委员，市民建妇女委员会委员，民建江夏区基层委员会委员，江夏区发改局干部。

作为一名90后的党外干部和基层政协委员，我曾在街道政协联络员的岗位上，亲身参与、见证了基层政协的发展与进步。在此过程中，深切领悟到了政协委员的使命之重、担当之切，也感受到党外干部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收获许多宝贵的成长经验。

一场会务“点燃”的初心

我与政协的故事始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那时我刚毕业参加工作，得益于党外干部这

一特殊身份，有幸参与到市两会的会务工作，负责港澳台侨界别政协委员的协调服务。

在两会现场，那庄重而热烈的氛围深深感染了我。我看到数百名来自不同界别、不同领域的政协委员齐聚一堂，为武汉的发展倾注智慧、建言献策。他们的每一句建言、每一份提案，都饱含着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盼。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星火汇聚成炬——心底悄然埋下一颗种子：愿以萤火之微光，融入这温暖而磅礴的力量。

在民建的培养下，两年后我如愿佩戴上了委员证，身兼区政协委员、党外干部、街道政协联络员三职。自豪之余，更知重任在肩。

从那以后，我积极参与一线协商活动，穿梭在大街小巷，倾听群众的心声；努力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以及无党派人士建立联系，大家一起交流想法，为社区发展出谋划策。每次参与政协组织的会议和调研，我都认真准备，在深入剖析社会热点问题的基础上，撰写高质量提案和社情民意。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我先后提出《关于促进强村公司健康发展的建议》《深耕文化软实力谱写“夏”韵华章》等提案，其中《关于加快规划武汉市城市下水道系统建设的建议》社情民意被直报民建中央；《关于预防校园欺凌的建议》社情民意在2023年4月被直报省政协。

那些挑灯改稿的深夜，那些与居民促膝长谈的黄昏，都化作履职路上最踏实的注脚。

社区调研“点亮”民心

四年履职时光，宛如一条缓缓流淌的长河，给我留下无数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而在这众多记忆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次参与社区调研活动时的经历。

那是一个冬日的傍晚，寒风凛冽，暮色苍茫，我与几位政协委员相约在下班后，深入对口社区开展调研。天色渐暗，路灯却一盏都没有亮起，四周漆黑一片，我们只能借助手机的灯光摸索着前行。道路十分狭窄，还坑洼不平，我们边走边听到居民的抱怨：“连路灯都不亮，这日子怎么过？”

经过一番深入了解，我们得知这一带



曹蕊

路灯已经坏了很长时间，居民们多次向社区反映，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社区工作人员也满是无奈地告诉我们，他们多次向上级部门提出维修更换路灯申请，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复。看着居民们无奈的眼神，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对此，我所在的政协工作小组一致决定将此问题以联名提案的方式上报至区政协，并当即开始深入调研。我们查阅相关政策文件，了解其他社区的经验做法，多方听取居民们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更换路灯线路、加强路灯维护管理等。

令人欣慰的是，提案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迅速组织研讨，筹措专项资金，着手解决该地段路灯问题。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当我们再次来到这个社区时，崭新的路灯齐列道路两旁，照射出灿烂的光芒。同时，脚下的道路也重新修整，变得宽敞平坦。居民们的脸上，则洋溢着幸福而满足的笑容。

那一刻，我们心中溢出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同时也真切感受到政协委员这份

职责的份量。那种感觉，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人心潮澎湃。

通过这次经历，我深知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不仅要关注国家大事，更要关心民生福祉；不仅要为政府建言献策，更要为群众排忧解难；不仅要提出建议和意见，更要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建言献策、服务社会。

履职与本职的“双向奔赴”

去年，我调任至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现代服务业相关工作。在本职工作中，我也常常借鉴政协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发现部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面临融资难、人才缺等问题，我想到可以采用政协工作中一线协商的方式来破题。

我以政协委员的身份，组织企业、金融机构和人才机构开展协商交流活动，把会议室搬到企业车间，让诉求与政策“零距离”对话。活动现场，企业代表们倾诉着发展中的困境，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认真记录，根据企业情况介绍适合的融资方案；人才机构也积极出谋划策，提供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建议。

这场面像极了政协协商议政，通过这样的交流，有效缓解了企业的发展难题。也让我深刻体会到，政协的协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能够汇聚各方力量，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更广阔的思路。

还有一次，在参与调研时，我发现许多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困难重重，尤其是缺乏专业的数字化服务支持。结合本职工作，我以委员身份撰写社情民意，建议政府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推动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推广。

没想到，相关建议很快就付诸实施，我们与多家数字化服务企业合作，搭建了面向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服务平台，提供从技术咨询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服务。一段时间后，企业纷纷反馈，生产效率显著提升，成本大幅降低。看到自己的建议能切实帮助企业，我感到无比骄傲。

在工作中，我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身份优势，既能从政策层面提出建议，又能通过政协平台，让企业需求与政策支持更好地对接。这让我明白，只要用心，就能在政协履职和本职工作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实现双促进、双提升。

四年履职，提案从纸上走向现实，初心从未褪色。在去年的江夏区政协两会上，我带着提案上会，代表党派作《关于推动汤逊湖沿岸文体公园建设，赋能科创大湖区发展的建议》协商发言。想到改稿至第五遍的深夜，恍惚又见那盏初遇的路灯。原来，无论是照亮居民小巷的路灯，还是照亮企业的星火，初心都是那簇为人民服务的心火。

未来，我愿继续做一颗“火种”，在政协与本职工作的“双向奔赴”里，燃烧青春，温暖江夏。

亲历武汉绿地中心建设背后的故事

◇ 李煜

人物名片：李煜，上海人，绿地集团华中区域管理总部、武汉事业部原总经理，武汉市十四届人大代表，致公党湖北省委经济委员会主任。

站在武汉绿地中心的观光层，俯瞰长江两岸的繁华盛景，内心感慨万千。这座华中第一高楼的建设历程，恰似一部浓缩的中国超高层建筑发展史，记录着中国建筑技术的突破与创新，也见证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智慧与勇气。

2012年派往武汉

1970年我出生在上海，毕业于上海复兴中学，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从事

室内设计工作，后来考取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并入职绿地集团，担任绿地集团装饰景观总监及酒店技术总经理。

2011年12月8日，武汉绿地中心举行奠基典礼，项目启动。按照最初规划，武汉绿地中心设计高度为606米，2012年规划更改，加上建筑顶部塔冠，整体高度达636米。超越当时在建的上海中心大厦（632米），一跃而为中国第一高楼，并成为仅次于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迪拜塔）的世界第二高楼。

在更改规划后不久的2012年3月24日，我被集团董事长张玉良派往武汉，负责武汉绿地中心的建设，自此亲历武汉绿地中心建设背后的故事。

636米的规划高度承载着武汉建设国家



2012年8月30日，武汉绿地中心举行地下土方开挖及支撑工程开工仪式（右二李煜）

中心城市的雄心。我深知这个高度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是物理高度的挑战，更是中国建筑技术的一次极限突破。项目团队汇集了国内外顶尖的设计、施工专家，我们立志要打造一座代表中国建筑最高水平的城市地标。

在位置上，武汉绿地中心正好地处武汉长江大桥与武汉长江二桥之间，位于张之洞创办的武昌车辆厂的旧址上，属于武汉滨江的天然中心。

武汉绿地中心原规划设计有120层，4层以下为18米挑高大堂，4—62层为办公，66—85层为总裁办公，86层及以上部分为丽思卡尔顿酒店。并且，在不同高度共设置了5个空中大堂，供市民游客作为观景平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7年1月17日，在武汉绿地中心建设高度达到430米之际，突然收到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一个通知，要求暂停建设。

民航中南局2015年出台的《民航中南地区民用机场净空航行评估管理办法》明确：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包括“机场障碍物限制面”及“机场航行服务程序保护区”，其

中“机场航行服务程序保护区”是以机场基准点为圆心，半径55公里范围构成的区域。按其管控要求，武汉天河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基本覆盖武汉全地域范围。

为尊重航空法，保护武汉空域，武汉绿地中心的总高度由636米调整为475米。作为弥补，武汉绿地中心顶部被改成停机坪，可供直升机起落。尽

管被限制了高度，但武汉绿地中心迄今仍是华中第一高楼。

与长江“暗战”

项目启动后组建了顶尖的设计和施工团队。由曾主持设计迪拜塔、上海金茂大厦等多个世界著名超高层的建筑设计团队——美国AS+GG建筑设计事务所负责方案设计，中南建筑设计院进行施工图设计，中建三局承担总承包施工。在初步设计阶段，我们就遇到巨大挑战：如何在长江边的软土地上打造如此高的建筑？

众所周知，要盖高楼先挖深坑。楼层越高，需要挖的地基也就越大、越深。

要盖这么一座摩天大楼，需要多大的坑呢？答案是：整个基坑面积约3.6万平方米，比5个标准足球场还要大。

由于大楼临江而立，滚滚长江成了工地的邻居，相距只有275米。长江此地段底深25米，而这栋楼基坑平均底深27米，比长江还低；中间基坑底更深达33米，比长江河床要低很多了。



2013年5月14日，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视察武汉绿地中心工地

总不能让工人和机械设备泡在水里施工吧？何况谁也不敢保证水压是否会对基坑及桩基产生影响。所以，如何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克服“水”的阻拦，成了挡在我们面前的第一座大山。

无非两个方案。一是“放水进来”，即在基坑施工中，不对基坑外部做完全隔离，而是实施基坑周边整体降排水；二是“挡水出去”，即建造一个“铁桶阵”，将长江水彻底隔绝在基坑施工范围之外。

经多轮商讨及专家论证，“铁桶阵”的方案成型。“铁桶阵”，学名地下连续墙，是用连续排列的混凝土地墙将基坑四周打围，将外围土层与内部施工区域隔离。建造完成的连续墙，墙体深入地下岩层，阻挡了墙外土层内的长江水，既是用于保护施工区域的维护性临时结构，也是作为高楼地下室外墙的永久性结构，一举两得。

经过1年的时间，施工方完成地下连续墙165幅，全

长1200米。这是亚洲最深、最大的基坑工程。

当时不少市民发出疑问，一年过去了，怎么看不到绿地高楼地面的模样？有的人甚至以为我们停工了，其实，这一年我们都在与长江进行“暗战”。

我们的地下连续墙垂直度设计要求达到1/500，远超其他地区的1/300的垂直度要求。在施工过程中利用施工机械自带的垂直度显示

仪和自动纠偏装置严格控制垂直度，以确保达到设计要求。

武汉地区岩层分布广泛、复杂，武汉绿地中心工程地下连续墙须穿越深厚的砂层，进入中风化细砂岩或中风化砂质泥岩，深达50多米，对下部致密砂层、强风化基岩、中风化基岩等岩层，液压抓斗施工较困难，普通冲击钻入岩工效低，每小时入岩约10厘米。

为了保证施工安全与进度，我们利用在南京紫峰大厦的施工经验，采用土力H-8双轮型液压铣槽机进行施工，每小时入岩约



施工现场俯瞰图

50厘米，工效为普通设备的5倍，大大提高了效率。

铣槽机在全国的保有量极少，不足十台，成本也非常高，每台约4000万元。我们采用的这种新型铣槽机彼时全世界只有3台。

“地下长城”浇筑好后，还不能马上开挖深基坑。先要在5个足球场大小的施工区域内打下3600多根桩基，所有桩基必须打到地下五六十米深的基岩上，有的桩基还要入岩1.2米深。平均是12天打一根桩，这就是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这栋楼一点都看不见“长”。掏空基坑内的土方要分6次完成，总土方量将近100万方，需要近6万台次渣土车才能运走。

2013年冬，浇筑底板那晚，零下7度的江风刺骨，300多人连续奋战66小时，混凝土一次性浇筑成功。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铁桶护城”。

云端的“黑科技”

大厦于2011年开工，到2014年8月才开始“钻”出地面。地上的难题接踵而至，最让我难忘的是核心筒施工阶段。我们创新



“空中造楼机”施工中

采用了“空中造楼机”技术，将工厂化建造理念引入超高层施工。这个重达2000吨的庞然大物，能够实现模板自动爬升、物料自动运输，创造了4天一个结构层的“中国速度”。

这是中建三局倾力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智能顶升模架系统（专业名“微凸支点智能顶升模架系统”），他们自主研发出第一代、第二代顶升模架系统，使超高层的施工进度达到8天左右一层。如今的第三代系统不仅更加安全智能，而且更加高效。该系统主要由钢框架系统、支撑与顶升系统、模板系统、挂架系统及附属设施系统以及一台ZSL380动臂塔吊组成，类似一个“钢罩”布置在核心筒上部，支撑在核心筒外围墙体上。

整个顶模体系重约2000吨，支撑与顶升系统支撑在核心筒剪力墙上，共设置12个支撑点，由6个350吨和6个300吨油缸组成，最大总顶升力约4000吨。

顶模的使用使施工电梯直达平台，实现了卸料平台、混凝土布料机、临建设施、物料堆场等与模架的融合。

在顶模平台上自带“两大一小”3台塔吊，实现了平台自带塔机爬升。顶模平台偏向于轻质化设计，平台自重约1900吨，支点顶升力达4000吨。同时采用先进的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模架运行状态、环境情况，确保平台安全、高效、精准运行。

武汉绿地中心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完成了多项施工技术成果，形成了独有的“5+10+30”的科技创新，即“自带塔机顶升模架系统的研发与应用”等5项自主创新技术、

“GPS+ 北斗系统双模控制测量”等 10 项核心技术。

绿色建筑的典范

这是一个设计科学、建设合理的大厦。

以幕墙为例，外立面呈现出独特的流线曲面体造型，截面由三瓣弧线巧妙构成，造型上并非完全对称，每 3 片一样，共有 8000 多种，空间构造极为复杂。为了解决安装精度问题，我们自主研发了智能安装机器人，将安装精度控制在毫米级。

幕墙玻璃使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北京鸟巢、上海歌剧院的同款——超白夹胶中空玻璃，共使用约 28400 片，使得该建筑能充分将自然光引入室内，降低建筑整体使用能耗；同时通过室内空调、新风系统及外幕墙上的自然“通风器”进行空气净化和清新空气的导入。

“通风器”的存在让外幕墙变成了“会呼吸”的幕墙。“肺叶”的清透，交给了专门的“擦窗机器人”，可 360° 旋转的伸缩手臂，让幕墙时刻保持耀眼光芒。此外，雨水可以通过幕墙单元板块的倒水口直接导入雨水收集系统，进行水回收和循环利用。

大厦内设有 84 部电梯，其数量比著名的哈利法塔还多 28 部，最快时速为每秒 10 米。采用全球首创的“单导轨架多笼循环运行施工电梯”，通过在导轨架上设置旋转换轨装置，实现梯笼高空旋转变换轨道并循环运行，从而实现在单个导轨架上循环运行数部乃至数十部梯笼。

武汉绿地中心钢板剪力墙高达 211.65 米，为国内房建领域最高，可抵御 8 级地震、



武汉绿地中心

17 级台风。剪力墙又称抗风墙、抗震墙或结构墙，在超高层建筑内部通过钢板并浇筑混凝土构筑而成，犹如“钢骨架”。

大厦还采用了包括地下水回收再利用系统、建筑废渣零排放技术以及方钢管与铝模板的环保材料，共同构成了大楼在绿色节能节水方面的 30 余项先进技术。

回顾武汉绿地中心的建设历程，我深深感受到：每一座伟大建筑的诞生，都凝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和汗水。虽然高度未达预期，但我们创下了多项纪录：211 米国内最高钢板剪力墙、可抗 17 级台风的“百年寿命”、全球首例单导轨多轿厢电梯……这些“隐形高度”，或许比数字更值得骄傲。

这栋楼非常值得武汉人民自豪与骄傲，作为亲历者，我深感荣幸。这段经历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序战失利（下）：九江战役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三

◇ 涂文学

战役部署

九江，楚头吴尾，湖北门户，中日双方对于其在武汉会战中的重要地位无不心知肚明。九江守，而拒敌于湖北之门外，可保武汉之安全无虞；九江失，则湖北门户洞开，武汉防御空间将大大缩小。

武汉保卫战序战至九江战役达到高潮。

日军占领湖口休整半月，1938年7月19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令“以主力配合海军急速攻占九江附近，然后准备向瑞昌、德安一线前进”（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P131）。其具体部署为，第6师团尽快开始前进，攻占黄梅附近；波田支队于

7月23日天亮前在姑塘附近偷袭上岸，攻占九江，并对星子方向警戒；第106师团继波田支队之后在姑塘附近上岸，经塔顶山南侧向七里湖南面地区前进；第101师团一部在后续部队上岸后推进到湖口附近，接替第106师团担任守备。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对于保卫九江高度重视，蒋介石在7月18日的日记中以为：“鄱阳湖与庐山自朱明以来，皆为我民族复兴最后胜利之地，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逆军决战，亦在于此，乃奠定统一全国之基础。今次与倭寇在鄱阳湖决战，若取得胜利，则基督在冥冥之中保佑中华复兴之效也。”同日，他还致电第5战区副司令李品仙，要求其加强对九江对岸小池口的防御，以协助九江之对日作战：“九江对面小池口应派

兵一团守备，并分一部至杨家湾、代家营（小池口东）驻守。须附能击军舰之炮四门或两门能配属战车炮更佳，以便协助九江方面之河川防御”（《蒋介石致李品仙密电稿》（1938年

7月18日），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27）。

负责江南防守作战的中国第九战区预判日军进攻方向：一方面日军有可能“以主力在星子附近登陆，攻取南昌、长沙，或趋岳阳，以切断粤汉铁路，包围武汉”。但另一方面更大的可能性是“以主力在姑塘登陆，以一部兵力于九江登陆，包围武汉，夺取瑞昌”。后来的战事进展说明这个预判是基本正确的，第九战区据此进行了兵力部署。

以张发奎第2兵团和薛岳第1兵团，包括第8、第4、第64、第25军和第3、第155、第187、预9师等部，约20万之众。此外还布置苏制1930年式76.2毫米野炮15门，1890年式115毫米榴弹炮18门，德制SFH18式150毫米榴弹炮6门，德制I EFH18式105毫米轻榴炮约20门，辽宁造14式77毫米山炮约15门，苏制47毫米战防炮约16门等，全力防守鄱阳湖以西至阳新富池口以东长江南岸。“当时负责防守九江—瑞昌地区的指挥官是广东籍张发奎将军和薛岳将军，他们率领了20万兵力驻扎于此地。他们的使命就是在此迎击日军，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主力轰炸机马丁139WC

迫使后者进入鄱阳湖地区”（〔美〕麦金龙《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武汉出版社，2008年，P49）。

张发奎7月10日离开武汉，14日抵达瑞昌，15日到九江，其所辖各部陆续到达指定位置。

战争经过

九江战役首先在空中展开。20日，中国空军3架重型轰炸机从吉安起飞，轰炸湖口江面日军舰船。日军亦出动大批飞机对九江各处中国守军阵地狂轰滥炸，阵地遭到严重破坏。22日，日本海军出动多架攻击机和战斗机轰炸狮子山、新港、拦江矶等国军阵地，新港以西、十里铺以南所筑工事被毁者甚多。23日，日军又出动20余架战机，对新港、桃花山一带及腾雀山东北与西面的中国军队、九江西南面的运输车队实施轰炸。

22日，日波田支队在20余艘军舰、100余艘汽艇的协护之下，由马影桥、梅兰口以西处，潜入鄱阳湖鞋山附近。23日零时，“敌乘暗夜在姑塘附近登陆，与我守军第29军团一部作激烈战斗。旋敌继续增援，



中日军队在南浔线九江龙开河铁桥展开激战

与我守军于九江东南高地附近发生激战，我以第70军增援反攻，将敌击溃。24日拂晓，敌更以海、空军猛烈轰炸，我攻击被迫停顿。午后，我第八军续向北进之敌攻击，激战至翌晨”。

25日，日军从空中、江面、地面三面向九江城发起猛烈进攻。空中方面，日军出动攻击机、轰炸机、战斗机对江面和地面狂轰滥炸，小池口、毛家港西北、锁江楼、百寺湖庄、岳师门西面、三里街至四里街之间道路、鸦雀山南面高地、马家高地、工厂南营等均遭轰炸。水上方面，日军以“坚田”“二见”“雉”等多艘舰船及第11水雷队驱逐舰，在九江上游截断国军后路。陆路方面，波田支队进攻鸦雀山、蔡家垅一线，于当日下午攻陷国军阵地；第106师团青木部队进至高垅南侧高地；海军陆战队土师部队3个中队当日傍晚在九江登陆并攻占机场，另一支海军陆战队在小池口上岸。

面对日军进攻，中国军队进行顽强抵抗。23日，以重炮、迫击炮炮击登陆的波田支队，打死打伤日军100余人。预11师第42团2连官兵与日军肉搏，全部壮烈牺

牲。在周家岭、猪桥铺等处，第15师第86团及第128师亦与波田支队发生激战，第19师第58旅在普泉山、塔顶山反击并占领了塔顶山。24日，日军在姑塘附近悉数登岸后，预9师和第25军分别在陈村、殷山、马祖山等地予以抗击并发动攻势。第29军团在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钻林山一线占领阵地。但在日军强大攻势面前，国军不堪与战，第70军溃退，第128师损军折将几近大半。中国

军队“经一再调队反攻无效。遂于25日晓奉令逐步转移”。（《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1938年8月7日）》，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14）。

26日，波田支队一部于早上7时攻入九江城，除主力在九江及其南部地区驻扎外，另派部队进攻狮子山，与吴奇伟所部第4军在螺丝山以南、狮子山、张家山之线对峙。九江在仅经过5天战斗失陷。“这场战斗从7月23日开始，至7月28日结束。尽管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日军极可能在这次进攻中再次使用了毒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薛岳在这次战斗中的指挥缺乏计划和组织，更糟糕的是，他过早和过于突然地对部队发出了撤退的命令，致使大量无辜的平民还来不及逃亡，就直接暴露在日军的铁蹄之下。日军对留下来的平民和士兵残酷无情，他们在九江重演了一场小规模‘南京大屠杀’”（〔美〕麦金龙《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武汉出版社，2008年，P49—50）。

日军完全占领九江城后，中国军队还

在九江外围与日军发生数天激战。27日，第119师第691团反攻夺回小池口，第349、354团在妙智铺，第539团在刘庄、九龙庙、风波脑等处，第4军及第155师在东林头、张家山、七里湖之线，李汉魂部第3、第19、第15、第187师及第9预备师在牛头山、十里山之线，吴奇伟指挥第128师、第11预备师在马回岭附近，俞济时所部第74军在乌石门、德安之间，王敬久部第190师在隘口街、第52师在星子与东孤岭一带，分别与日军交战。28日，第4军第59、第90师在狮子山、张家山、七里湖之线曾一度夺回被波田支队攻占的狮子山炮台。另外数百人在流泗桥与日军第101师团发生激战。29日，第155师第925团在东林头和黄茅垅一带、第929团在平湖岭等处与日军交战，500人夜袭彭泽101师团，毙伤日军约80人。30日，第11师第31旅、第52师第159旅、第46师在流泗桥、彭泽周边地区与日第101师团佐枝支队交战。

九江守失，武汉门户洞开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军队在日军强大攻势面前，反击效果并不明显。据张发奎事后报告，“自敌突破鸦雀山并在九江附近登陆后，即令第四军由狮子山、张家山亘蔡家湖之线收容各军。时值昏夜，仓促占领，工作〔事〕未能构筑。拂晓后，敌遂利用九莲公路，以装甲车及炮兵向我进攻，且该线离九江过近，同时并受敌海军炮之射击。按地形比较，似不如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钻林山亘成湖之线阻止敌人为有利。经商薛总司令代为请示钧座，奉准允行，遂于27日晚令第四军于黄昏后开始向第二线转进。午夜接薛总司令转示钧谕，仍守原线，自应遵办。惟当时各部业经陆续移动，若再令推进恐滋混乱，有违钧旨，无任惶悚”（《第二兵团司令张发

奎报告书（1938年8月7日）》，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15）。

日军方面为巩固战果，在完全占领九江后，向庐山东麓之狮子山及张家山发起攻击，并于当晚占领狮子山和灰山炮台。29日，又占东林头。30日，进攻沙河，第106师团推进至七里湖西南骆驼山、纱帽山一线。31日，第106师团占领沙河及倾头罗北侧高地，第101师团进攻流泗桥西南国军阵地。中国守军基本退出九江战场，于东孤岭、牛头山、金官桥一线与日军对峙。（参见李少军主编：《武汉保卫战史事日志（军事卷）》，武汉出版社即出）。

失败原因

九江战役失败，既有日军过于强大，中国军队装备落后等客观因素，更有国军指挥失误、信心不足和军纪涣散等主观原因。对此，指挥九江战役的张发奎在1938年8月7日的报告书中做了系统反省：

一是“交通破坏过早，阵地未能预先完成”。“查九江附近公路如九星、九瑞、瑞昌至阳新、瑞昌至德安、永修至箬溪以及南浔铁路北段，早经彻底破坏，九江附近工事，事先亦未构筑。此次于短期内决定固守，九江军队虽勉强集中，而交通困难，筑城材料运输不及，阵地无法立臻巩固。职到浔视察时，野战工事仅及三分之一，因之不能长期固守”。

二是“运输不良，兵站设施欠缺”。“九江方面兵站，事前殊欠准备，临时无人负责，使前线部队白昼困于飞机轰炸，夜间一面作工，一面运米，兵力疲敝，警戒自难周全，实为致败之因。故自敌在姑塘登陆后，九星



日军进入九江环城路

路不能利用，在九江附近部队将近 10 万，仅恃九江至马回岭小径为后方联络线，因之粮弹之补给、伤兵之后送，均无法实施。士兵枵腹应战，伤兵呻吟道左，作战精神，顿形颓丧”。

三是“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因而强奸掳抢，军行所至，村舍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忭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

四是“联络不确，未能协同”。“查各部因通讯器材缺乏，致各军、师间及步、炮间纵横方向联络，均欠确实，即联络员亦甚少派遣，各自为政，互不相谋，故不能适时相互策应，收协同之效”。

五是“警戒疏忽”。“查防守江湖各部，曾奉令飭团长以上主官值夜巡查，职召集各军、师长会议时，虽亦经传谕告诫，并亲往巡视数次，乃各级官长仍有奉行不力者，致任敌在姑塘从容登陆，事先既失于察觉，事

后复无法驱逐。又：敌在 12 时登陆，至 4 时 1 刻始接第八军电话报告，致失增援时机”。

六是“高级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力掌握部下”。“职此次在浔数日，与师长以上各级将领晤谈，每多借口新兵过多、防区过大或武器不足、战斗力弱，动摇必胜信念，影响作战士气；益以中下级干部掌握不力，精神涣散，故每遇敌机袭击，多数溃败，甚有未见敌人，溃不成军者”。“此次预备

第十一师，因警戒欠周，影响九江战局。第一二八师增援不力，反自溃散，虽因新兵过多，且受敌机威胁。但官兵平时缺乏教育，临阵各级官长均无掌握之力，自无可讳言”。（《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1938 年 8 月 7 日）》，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 年，P214）。

总起来看，武汉保卫战之序战，自 6 月 12 日日军进攻安庆拉开帷幕，中经 6 月 26 日马当失守和 7 月 5 日湖口失陷，再到 7 月 26 日九江陷落，不到一个半月，日本侵略者便杀过皖赣，兵临湖北，武汉外围阵地为日军所据，湖北门户顿开，以中国军队完败而结束。序战的快速结束，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备战极为不足，军力过于弱小，军纪严重涣散等弊端，也预示着武汉保卫战的发展走向和失败结局。

涂文学，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中山创立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

◇ 曹 波

近代中国，孙中山先生是站在时代前沿的伟大人物。今年是孙中山逝世 100 周年，对孙中山存世的珍贵文物进行深入研究，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武汉是首义之城。1981 年，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之际，武昌起义纪念馆（红楼）对外开放。2011 年，为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又在红楼南面兴建了辛亥革命博物馆，一飞冲天的 V 字型建筑造型，浓郁荆楚风格的“楚国红”色调，2.2 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构成武汉城市的新景观。两馆与“首义胜利的开端”起义门共同构成首义文化区的中轴线。2022 年，为进一步擦亮辛亥首义文化品牌，两馆合并组建为辛亥革命博物院。

辛亥革命博物馆集辛亥革命历史展示、文物收藏、学术交流、科研等功能于一体，我有幸参与了博物馆的筹建，并带领业务人员致力于相关文物史料的征集与研究。一次

偶然机会，我在广东接触到一张孙中山创立的《少年中国》晨报，出于职业敏感，对它留下初步印象。直到 2016 年 11 月 20 日，美国方李邦琴女士将其珍藏的 1918 年 11 月《少年中国》晨报合订本捐赠给辛亥革命博物馆，才有机会认真研读这份创立于百余年前的报纸。

方李邦琴捐赠《少年中国》晨报

方李邦琴女士是著名华裔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在美国新闻界、商界、政界均有广泛影响力，一直致力于增进中美交流、促进中国和平统一，2015 年在美国出资创立海外第一家抗日战争纪念馆。大家对她很尊敬，称她“方太”。

2011 年，纪念辛亥革命 100 年之际，武汉市政府授予方李邦琴“荣誉市民”称号。我因为参与筹建辛亥革命博物馆，开始关注

这位传奇人物。方氏家族曾拥有报纸和印刷厂，她的先生方大川，从1950年代开始先后供职于《世界日报》《国民日报》，从1970年代开始担任《少年中国》晨报社长10多年，由此再次关注《少年中国》晨报。经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得知《少年中国》晨报在孙中山创立的报刊中，存续时间最长，曾大量记录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理应得到辛亥革命研究、孙中山研究的重视。遗憾的是，该报纸留存在国内的并不多，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2015年9月，武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汪海鹰前来辛亥革命博物馆，参观“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书画作品展”，我向她汇报辛亥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

每年10月10日，我们组织海内外民间收藏团体和个人，向辛亥革命博物馆无偿捐赠藏品，丰富了馆藏，充实了陈列，并打造出“双十捐赠”品牌。汪海鹰副部长对“双十捐赠”活动很感兴趣，听说收藏了一批珍贵的抗战将士墨迹，更主动表示与海外抗战纪念馆的方李邦琴联系，争取得到她的支持。

这是一个良好契机，让我倍感兴奋。经汪海鹰副部长牵线搭桥，我鼓足勇气与仰慕已久的方太通了电话，介绍武汉对首义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辛亥革命博物馆的情况，分享我对《少年中国》晨报的初浅认识，并邀请她前来参观指导。当我还在担心是否唐突的时候，她爽快答应了我，并肯定我对《少年中国》晨报的了解。更令我惊喜的是，她当即表示，下次回国时向辛亥革命博物馆捐赠一份《少年中国》晨报原件。



方李邦琴捐赠的民国七年十一月《少年中国》晨报合订本

2016年10月底，我即得到回信，方太将回北京参加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会后要专程来武汉捐赠。那天，武汉市副市长刘英姿带着我去高铁站迎接。在辛亥革命博物馆，我们举办了简短而热烈的仪式，方太将珍藏的1918年11月《少年中国》晨报合订本等文物、资料，一并捐赠给辛亥革命博物馆，使之回归首义之地。

2018年11月24日，我又一次在辛亥革命博物馆接待方太，当她看到《少年中国》晨报原件配合辛亥革命基本陈列重点展出，并设置电子屏进行数字化展示时，高兴地说：“能将代表孙中山先生伟大精神的珍贵文物、资料带回首义之城，并在辛亥革命博物馆得以保护和利用，让广大观众近距离了解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我感到十分欣慰。”

孙中山与《少年中国》晨报

《少年中国》晨报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时代产物，前身为《美洲少年》周刊，是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华侨李是男（即李公侠）、

黄伯耀、温雄飞、黄超五等人，于1908年在旧金山合作创办的一份周刊，用于宣传革命。后来，李是男在香港加入同盟会，回美后与昔日同伴发起成立少年学社，将《美洲少年》周刊作为少年学社机关报。

1909年，孙中山从欧洲抵达美国旧金山，以少年学社成员为基础，成立“美西同盟会”，孙中山亲任“主盟人”。成立不久，因为成效显著，很快升格为中国同盟会美国总支部，正式成为同盟会在美大本营。1910年，在孙中山的倡导下，将《美洲少年》周刊改为日报，创立《少年中国》以晨报的形式出版。8月19日开始发行，至1991年4月1日停办，历时80余年，在海外革命报纸中最为悠久。

《少年中国》晨报中文报名由黄兴手书，在第一版右上角竖排。英文报名“The Young China”在第一版报眉中间横排，其下英文标明“THE ONLY CHINESE MORNING PAPER IN AMERICA”（美国唯一中文晨报）。起初用黄帝纪元标示出版日期、公历纪元标示发行期数，中华民国成立后改为民国纪年。该报每天出版一期，每期四版，设有“重要新闻”“中国新闻”“美国新闻”等。第一版栏目主要有“笔权”（后改为“论说”，相当于社论），刊登政论性文章。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瞬息万变。《少年中国》晨报和中国来往的通讯速度很快，每有重要新闻还马上刊出“号外”，一天至少有两三次之多，在新闻史上创下记录。作为同盟会在美国的革命舆论阵地，《少年中国》晨报致力于宣传革命、筹借款项、支援国内革命党的武装起义，系



2016年11月，方李邦琴（左）向辛亥革命博物馆捐赠《少年中国》晨报时与作者交流

统阐述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和主张，引领舆论导向。孙中山称赞该报的创立“使革命思潮，为之澎湃不可抑”。

早期发行的《少年中国》晨报，国内比较少见，研究者深感遗憾，无法通过它探究海外辛亥革命活动。值得庆幸的是，方太赠送我个人的《孙中山与〈少年中国〉》一书，选编了早期《少年中国》晨报的一些图文资料。该书及其1918年11月《少年中国》晨报合订本，让我得以通过珍贵的史料，了解辛亥革命前后，《少年中国》晨报对革命精神的传播，感受辛亥革命的复杂进程和深远意义。

《少年中国》晨报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为了推进革命主张，革命派与保皇派主要在《民报》《新民丛报》展开一场思想大论战，重点围绕是维护帝制、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等问题进行。在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



2017年，作者赴美参加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联席会期间，专程到旧金山方李邦琴（左）家中拜访

与为保皇党发声的《世界报》激烈笔战，揭穿保皇派对革命的歪曲宣传，争取华侨支持及美国当局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1911年，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黄兴负伤撤回香港，林觉民、方声洞等80多人牺牲，其中72人的遗体由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寻获，安葬于广州黄花岗。《少年中国》晨报于7月7日、8日连续在头版“笔权”发表“世界报伪电伪新闻之铁案”文章，针对保皇党在《世界日报》上造谣黄兴已死，意图破坏美洲革命机关的谎言，针锋相对指出革命党是吓不倒的，“继黄兴而起者，不虑千百万”“惜乎黄兴君以出险闻，伪电愈演愈现”，让保皇党伪造新闻现原形。还有《笑保妖造谣诽谤之无价值》《保皇会总理大骂康有为之痛快》《驳梁启超书》等文章，揭露了保皇党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的真面目，鼓动华侨积极支持革命。

7月至9月，《少年中国》晨报又接连在“笔权”发表文章，如《今日追悼广州革命军之殉义》《观追悼广州革命殉义诸公盛

会感言》等，赞扬广州起义，追悼革命志士“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号召海外华侨继承先烈遗志投身革命；又如《革命军布告》《敬告革命党人》等，向海内外国民宣告：国民革命的目的“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则为自由平等博爱”“一废灭鞑虏清朝”“二建立中华民国”“三实行三民主义”，广泛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并积极为革命筹饷，“凡我同志”都要“优礼相迎”“慷慨相助”“大举义旗”。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2日开始，《少年中国》晨报迅速响应，连续刊发消息、时评、图片，如《总统既立 中华民国之基已定位 华侨宜踊跃助款以竟全功》《庆中华民国举孙总统之得人》《孙总统接见将官》《政治革命之先决问题》等，积极而热烈的宣传革命，并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革命理念介绍给民众。同时，刊载《汉阳五日血战记》《南京两日战事记》《中国大革命之风云八十五志》等，反映各省光复的新闻，极大提振了广大华侨的信心，推动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方李邦琴评价：“《少年中国》晨报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间，所提供的丰富信息及所阐发的新锐观念，皆与辛亥革命的主旨或深相契合，或相与辨难，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极富历史现场感的图景。”

《少年中国》晨报视角下的1918

翻开1918年11月《少年中国》晨报合订本，会发现它的“论说”栏目，多结合

国内外时政宣传革命思想，文章立论精辟犀利，富有战斗性。

——拨开第二次南北议和的迷雾。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北洋军阀内部渐趋分裂，中国进入更加混乱的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1917年6月，黎元洪非法解散国会。7月，张勋复辟。段祺瑞讨伐张勋后，自任内阁总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并组织由段系分子操控的“安福国会”。

为了维护民主共和、实现国家统一，孙中山毅然竖起护法大旗。段祺瑞上台后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引起西南军阀的恐慌。西南实力派军阀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等基于自身利益，也加入了护法运动。南北双方兵戎相见，中国大地再次陷入南北分裂的境地，国内外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北双方于11月分别下令停战、退兵。经过数月酝酿，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会在上海正式开幕，开始了第二次南北议和。

1918年正是第二次南北议和的酝酿时期，《少年中国》晨报以积极、明确的态度，多次在“论说”栏目中，对议和的虚伪性进行无情揭露和斗争，对徐世昌非法政府披着和平外衣迷惑民众的阴谋给予沉重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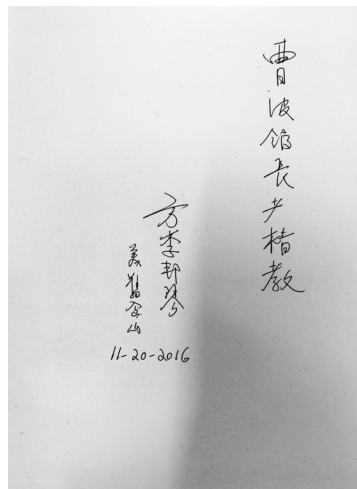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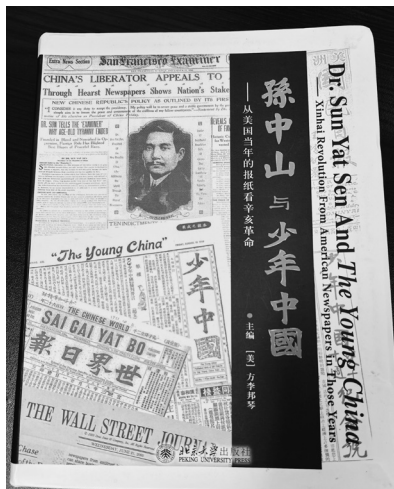
《少年中国》晨报直接指出，通过议和使中国走上和平之路是不可能实现的，“今人以徐世昌登台，颇有蕲望和平者。愚以为事实上之不可能”。议和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清朝遗老、旧臣在南北各派系中身居要职，他们思想腐朽崇尚专制，阻挠立宪共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国

内专制力量并没有完全铲除。许多旧官僚趁机投机革命并担任要职，这些人从骨子里抵制民主共和，由他们倡导的和谈，结果可想而知；二是非法总统徐世昌敷衍时势、假意谋和。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上台后提出“偃武修文”，极力主张议和，借此提高自己的声誉，使非法政府合法化。《少年中国》晨报指出，徐世昌“相清而清亡，佐袁而袁覆，后乃主使张勋复辟。其他罪恶，罄竹难书”，是一个思想陈腐手段阴险之人，披着主和的虚假外衣，实际上是为自己博取好名声。

针对南北议和的声调甚嚣尘上，《少年中国》晨报认为，主和者无外乎以下几种心理：对时局持观望态度，不知道谁胜谁负，保持中立的主和可以两不得罪；政局动荡，为保障既得利益，赞同似是而非的主和；民众急切渴望和平，主和可以赢得民心。不管出于哪种心理，都是为了一己私利，没有真正为国家为人民谋福利。

《少年中国》晨报中的“论说”，一针见血指出各派军阀主和的虚伪和敷衍，对非法政府的阴谋加以无情揭露，对徐世昌等



方希邦琴赠送给作者的《孙中山与少年中国》

虚假主和者给予猛烈抨击，表现了革命党人民主革命的坚定立场，在美国华人华侨中宣传了民主革命思想，引领了舆论导向。

——揭露“西原借款”侵华图谋。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局动荡，内阁总理几易其主，党派纷争也日益剧烈，最可怕的是国家财政困难，已处于民穷财尽、朝不保夕之境。北洋政府时期，几乎所有重大的内政运转都离不开借款，历届政府均视之为法宝。其中，除袁世凯政府的“善后大借款”之外，段祺瑞政府的“西原借款”以数额巨大、牵涉众多国权作抵押而引人关注。

翻阅《少年中国》晨报，发现其对“西原借款”的情况、传闻多有报道，而革命党人的态度也可从“论说”《大借债与吾民》中了解一二。

1916年10月，日本内阁发生更迭，继任首相寺内正毅改变强硬交涉的侵华策略，以大量借款为主要手段，对华加强政治拉拢和经济渗透。这对段祺瑞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在重任总理后极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急需大量款项镇压孙中山护法运动、打压其他派别军阀力量。

“西原借款”是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的总称，由段祺瑞政府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经手，其中最大的8次借款总额达1.45亿日元。为了获取这笔款项，段祺瑞以东北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森林开采权为担保，为日本日后全面侵占东北提供了方便。

日本更借此不断加大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进而渗透到政治领域干涉中国的内政。这种损害国家主权换取借款的行为，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纷纷奋起反抗，“不观夫吉黑林矿借款，甫有成议。两省人民约

举代表，同集京师，呼号请命”。北京报界积极给以舆论支持，“此消息传布之后，京师报界于二十一日报端记载者，共有《中华新报》等八家”。段祺瑞政府采取极端手段进行打压，对报社冠以违反“戒严法”的名义予以查封。

《少年中国》晨报发表评论《大借债与吾民》，从国民利益角度出发，对段祺瑞政府的大借款行为展开猛烈抨击，剖析“西原借款”危害之大，痛心疾首之情不言而喻。革命党人指出，“西原借款”不是为国家、为人民，而是段祺瑞政府为满足个人野心的行为。借款的用途虽名为政费、军费之用，但实际上却为当道官员举以自肥提供了捷径，“而卖国派如曹汝霖、如陆宗輿，更不惜乘此时机，博取大宗回扣”。这种借款，不仅增加国家的负担，使财政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也不利于国家的独立民主。

《少年中国》晨报批判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为，声援了民众的请愿反抗活动，彰显了保护国家利益的革命力量，宣传了不畏权贵的革命精神。

——关注一战后的国内外局势。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逐渐走向尾声。革命党人密切关注着整个战争，《少年中国》晨报中对战后国际局势做了大胆预测，对战后中国国民应有的态度予以建设性引导。

《少年中国》晨报从分析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入手，大胆预测一战后的和平是暂时的。一战的爆发，表面上是因为对巴尔干半岛的争夺，加上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被刺这个导火索，实际上“终为人类患之真因，即在各人之争利，各人之自卫其利也”。深刻认识到：只要列强迫逐利益之心不变，种族歧视观念不变，战争就不能彻底

避免，“此次结局，特休息以养元气，备为他年大决雌雄，争胜负于最后耳”。

对于一战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少年中国》晨报关注的焦点。一战的主战场虽然在欧洲，但中国是主要参战国在东亚争夺的焦点，对华政策也是一战后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么，中国国民对一战的结束应该持何种态度呢？《少年中国》晨报指出，一战的结果并不是单纯的一国战胜另一国，而是正义民主战胜了专制武力。一战彰显了民主和正义的力量，中国国民应该借此良机继续高举民主正义的大旗，与国内崇尚专制武力的北洋军阀斗争到底。

1918年5月，护法战争失败，使革命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在一战胜利之际，《少年中国》晨报“论说”栏目以连载形式发表《论我国民对于欧战休止应持之态度》，撕破徐世昌等人的假伪和平面目，呼吁海内外国民奋起反抗，铲除国内崇信专制之旧势力，使中国实现真正之民主。

一战期间，中国以派遣劳工的形式参加了协约国一方的作战，很多劳工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付出了生命，表现出中国国民为世界民主而战的热诚。《少年中国》晨报认为，崇尚正义人道是中国国民的传统美德，国民应该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在国际社会塑造良好的中国国民形象，以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总之，《少年中国》晨报“论说”栏目，多结合国内外时政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运动发展，充分体现了它作为海外重要革命舆论阵地的作用，为我们研究海外辛亥革命史、海外华侨革命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参考文献：

- [1]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 [2] 方李邦琴：《孙中山与少年中国——从美国当年的报纸看辛亥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3] 幸存：《大借债与吾民》，《少年中国》晨报1918年11月9日第1版。
- [4] 《借款新潮之种种》，《少年中国》晨报1918年11月10日第1版。
- [5] 无畏：《欧战结局后之世界》，《少年中国》晨报1918年11月15日第1版。
- [6] 无射：《讨伐徐世昌》，《少年中国》晨报1918年11月16日第2版。
- [7] 芦隐：《调和之梦》，《少年中国》晨报1918年11月21日第1版。
- [8] 段云章：《论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 [9] 杜永镇：《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选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5年第7期。
- [10] 方积根，胡文英：《美国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第4期。
- [11] 邹晓辛，吕廷涛：《略论南北议和中的孙中山》，《学术界》1989年第2期。
- [12] 李晓兰：《民初报界的涉外借款观》，《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曹波，研究馆员，武汉革命博物馆原党委书记、馆长，曾任辛亥革命博物馆馆长

雷锋，一张照片的“武汉情缘”

◇ 余 玮

步入武汉东湖学院雷锋文史馆，可以看到一个巨幅展板，那是18岁的雷锋神采飞扬，站在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下，右手臂搭一件毛衣，左手拎一个印花提篮，一股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长江大桥下的青春身影

1958年11月12日夜幕低垂之时，一列北上的列车停靠长沙火车站，检票口涌进一群男女青年，他们是辽宁鞍钢在湖南招收的一批新工人。临时编组时，从望城县团山湖农场来的雷锋担任第三小组组长，组员有易秀珍、杨必华、张月棋等人。

旅途中，雷锋的热情开朗和助人为乐，给易秀珍留下很好印象。从相互介绍中得知：雷锋原名雷正兴，鞍钢到望城县招工，他征得组织同意报名并改名“雷锋”，寓意



1958年11月13日，雷锋在武汉长江大桥留影

“登高望远”。县委副书记赵阳城听说后，认为改“峰”为“锋”更好，寓意“到鞍钢去打冲锋”。

次日早上8点多，列车到了武昌站，因换车逗留几小时，招工负责人同意大家逛逛。易秀珍和杨必华跟着雷锋去看武汉长江大桥，“万里长江第一桥”让雷锋十分兴奋。杨必华后来回忆：“辽阔的长江，雄伟的大桥，使我们目眩神驰，赞叹不已。雷锋站在江边仰望着大桥，眼里闪着激动的光亮。他忽然说了句：‘原来全是钢铁呀！’……雷锋神情庄重地指着大桥说，下层铁路桥是钢铁造的，上层公路桥也是钢铁造的，这需要多少钢铁呀！”面对钢铁巨龙，雷锋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更添建设祖国的信心。

雷锋看到桥头一侧有摄影点，前去摄下一张全身照。尽管雷锋的童年饱受苦难，但透过这张留影，可以看到他对生活充满热爱。照片提篮上的鲜花图案，曾在1960年代用技术处理抹掉——鲜花当时在一些人眼里意味着“小资情调”。20年后，原照片才得以公开。

季增作为沈阳军区摄影员，与雷锋相处两年零八个月，为雷锋拍摄了大量照片。他接受采访时说：“雷锋爱美，很阳光，热爱生活，每到一个地方爱照相。”

从长沙到鞍山2000多公里旅程3天，雷锋在武汉、北京停留期间都有留影。雷锋后来在《我学会开推土机了》一文中写道：“一路上经过了武汉长江大桥，经过了首都——北京，同时我还在北京参观了一天，我看到了许许多多新鲜的东西。”

与雷锋在桥头堡“同框”

雷锋在武汉长江大桥的留影，是雷锋自己一生的珍藏。战友乔安山回忆说，1960年1月雷锋应征入伍，他很喜欢照相，时常拿出照片给战友们看。众多照片中，雷锋最

喜爱3张，其中两张是在天安门前拍的，还有一张就是在武汉长江大桥前的留影。“雷锋当时告诉我，这就是咱们建国以后修的大桥，底下跑火车，上头跑汽车，多漂亮。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薛三元曾任雷锋的班长和排长，雷锋牺牲时在大同。回部队后，他看到的雷锋遗物中就有这张照片。

雷锋在武汉长江大桥的留影，也带给武汉人一份特别的欣喜。201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60周年，雷锋的照片出现在纪念图片展上，格外引人注目，许多观众翻拍留存。

武汉东湖学院雷锋文史馆拍摄宣传片时，笔者提议青年学生追寻雷锋身影，手持这张照片与武汉长江大桥同框留影，以追思一位英雄与英雄城市的红色印记，表达新时代对英模的敬仰。当然，能在11月13日那天留影，更有不一般的象征意义。美术工作



《雷锋在武汉1958年》（版画）郭伟利

者对雷锋这张照片情有独钟，还原历史场景创作了版画，雷锋的青春风貌十分传神。

2023年2月，85岁的王孝云老人看到雷锋大桥留影，惊喜地说：“这照片，就出自我们大桥照相馆摄影师之手啊！”王孝云17岁到武汉显真楼照相馆当学徒，3年后成为摄影师。1961年，王孝云调到大桥照相馆当外景摄影师，一直工作到60岁。他回忆说，当时照相馆在大桥有3个固定拍摄点，可以较好拍下大桥雄姿，特别受游客欢迎，“雷锋这张照片的拍摄点正是其中之一”。

伟人在武汉看到雷锋事迹报道

1962年，《解放军画报》第6期刊发《五好战士与红领巾》专题，对雷锋进行集中宣传。在那张许多人非常熟悉的毛泽东主席阅读《解放军画报》的照片上，老人家凝神阅读的就是《五好战士与红领巾》。

照片的拍摄者、毛泽东主席随身摄影记者吕厚民回忆，这张照片拍摄于1962年7月，毛泽东主席正在武汉视察，工作之余在东湖宾馆一堆报刊中挑出《解放军画报》，看到了有关雷锋的报道。

一个多月后，雷锋因公牺牲。1963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连续十几天集中报道雷锋的生平事迹，发表相关社论和评论，再次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主席仔细阅读后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

“雷锋值得学习啊！向雷锋学习，也包括



1962年，毛泽东主席在武汉东湖阅读《解放军画报》
吕厚民摄

我自己，我也向雷锋学习。”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之前，第一次讲“向雷锋学习”。

随后，毛泽东主席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在全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学雷锋热潮，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雷锋印记”闪耀江城

2022年3月，辛亥革命博物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联合主办“永远的雷锋”主题展。在一张1963年3月武汉歌舞剧院大型歌剧《雷锋》的节目单上，有歌剧选段、雷锋日记摘抄及一幅雷锋半身画像。武汉歌舞剧院一级指挥、男高音歌唱家朱全维回忆，剧院在第一时间创作演出了八场歌剧《雷锋》，短短一月内就将雷锋形象搬上歌剧舞台，他当时负责合唱排练。歌剧《雷锋》不仅主题思想鲜明深刻、生活气息浓厚，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创新，构思巧妙。此剧及



1963年3月，武汉歌舞剧院大型歌剧《雷锋》节目单

时配合学雷锋热潮的兴起，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湖北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就是“学雷锋的故事”——这是雷锋与湖北的又一次结缘。

据《武汉地名志》记载，武汉曾有两所学校以“雷锋”冠名。一所雷锋中学，位于江岸区六合路3号，1965年建校名六合路中学，1967年改名雷锋中学，1983年与武汉六十七中合并。一所雷锋二中，位于江岸区岳飞街6号，旧址原是法国殖民地雇佣军安南兵营，1920年代改建为法汉中学，解放后在此创办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后改为岳飞街小学，1967年改名雷锋小学，1971年改名雷锋二中，现为武汉二十中岳飞街校区。

如今，武汉10多所校园设立有雷锋塑像。武汉小学不仅有雷锋塑像，还开辟“平凡的伟大——雷锋文化阅读专区”。洪山高中有雷锋纪念馆、雷锋广场、雷锋雕像、学雷锋志愿服务队。武汉三中有雷锋等全军十大英模塑像。大兴路小学升旗台旁，“雷锋”昂首站立，学生组成“雷锋塑像护卫队”。

此外，武汉不少公园、社区也有雷锋塑像。

雷锋是一个象征，一个精神符号。在新中国历史上，雷锋是影响人群最广、影响时间最长、影响力最深远的全民青春偶像。全国以个人命名的纪念日，只有“学雷锋日”。武汉的“活雷锋”不断涌现，吴天祥、朱伯儒、长江救援队、“红巷爷爷”“红巷苗苗”……一代代用实际行动诠释和弘扬雷锋精神，成为雷锋精神在新时代

的延续和发展，赋予了雷锋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武汉东湖学院是“全国文明单位”，设有全国首家雷锋主题文史馆及雷锋文史研究会、雷锋文史研究中心，办有《雷锋文史报》。学校请回一个“雷锋”，走出一批“雷锋”。东湖学子从这里出发，走进社区、公园、车站、福利院，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这里也成为传承雷锋精神的生动课堂，每年迎来众多各界人士参观学习，加入到学雷锋的队伍中来。

余玮，共青团中央《中华儿女》首席记者、《中华雷锋报》总编辑，武汉东湖学院特聘教授、雷锋文史馆名誉馆长

旧江汉关攫取非海关业务特权

◇ 李笙清

19世纪中叶以前，汉口是享誉国内的传统商镇名埠，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被迫成为通商口岸之一。

1862年1月1日，华中地区第一个近代海关——江汉关正式设立，驻节汉阳的汉黄德道道台郑兰成为江汉关第一任监督。第一任税务司则由英国人狄妥玛担任，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但外籍税务司并不满足，而是以海关为据点，将与海关业务无关的事务大包大揽。

江汉关设立之初，仅管辖本地区业务，主要职责是稽查来往船只、盘验进出口货物、征收子口税。1876年清政府根据《烟台条约》增开长江沿线的大通、安庆、湖口、

武穴、陆溪口、沙市6处通商口岸后，江汉关开始监理稽查此6处事务，重庆关亦归江汉关管辖。同时，在总税务司的推动下，江汉关掌握了港务、航道、引水、气象、邮政、检疫等业务，攫取了更多原本不应由海关监管的特权。

地方政府无权干预港务管理

江汉关一建立就插手汉口港务管理。1863年5月18日，正式开关仅4个多月就制定了《汉口港务章程》。港务直接与江汉关水运贸易、船舶航运管理息息相关，从1874年5月7日至1949年4月9日，江汉关对该章程进行了5次修订，达42条之多，



20 世纪初，汉口英商太古洋行临江货栈仓库

对汉口港船只停泊界限、移泊、载运军火、油类或易燃物品、船舶管理、航道保护等都有详细规定。

为加强对汉口港务的管理，江汉关税务司在关内特别设立港务课、巡江司等机构，攫取港务的行政管理权。由英国人担任港务长一职，对船舶进出港、货物装卸、港区水域和陆域的使用统一管理。江汉关经常派员测量港内航道，在浅滩及沉船处设置警示船浮标，每天都要派巡艇在港内四处巡查。

根据 1913 年的《汉口港务章程》规定，港务长只接受江汉关税务司领导，地方政府无权干预，其权限主要有船只的停泊、下碇或迁移，兴筑各式码头、驳岸及设置浮码头、趸船浮标等河岸工程，趸船停泊等。

国民政府曾数次试图接管江汉关的港务管理权，但一直未能奏效。1934 年 9 月 1 日，汉口市政府设立“汉口市码头业务管理所”，向江汉关港务码头管理渗透，没能如愿。在两年多时间里，职能只是管理码头工人、处理码头纠纷，港务管理一直被江汉关排斥在外。1946 年至 1947 年，国民政府长江区航政局设立了一个港务室，名曰“港务管理”，实际上仅管理汉口沿江 6 个公用码

头的船舶指泊、航行咨询和收费事宜等，汉口港务管理大权依旧被江汉关牢牢掌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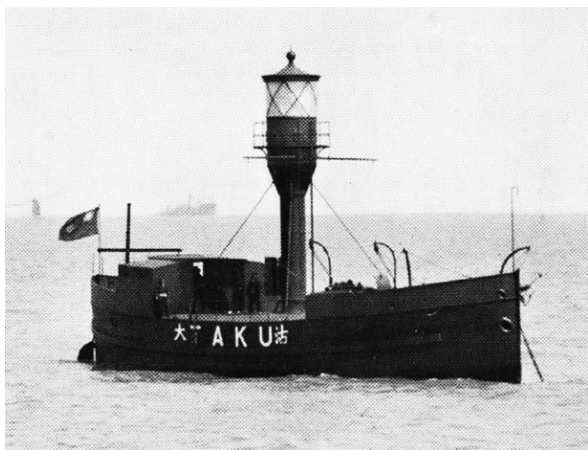
1949 年 5 月 16 日，武汉解放，5 月 26 日，江汉关由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关贸易处接管。10 月 25 日，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成立，江汉关直属海关总署领导。1950 年 1 月 15 日，江汉关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汉口关，10 月 16 日改称武汉关。

1950 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将管理海港、灯塔浮标、气象报导等助航设备的职位，连同其工作人员、物资、器材，全部移交中央交通部或各市的港务局。10 月 15 日，所有 322 名职工由中央交通部航务总局接收，江汉关对港务长达几十年的管理从此落下帷幕。

武汉水域航道尽由把控

根据 1858 年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 10 款，征税、海务、船钞统统划归海关管理。1864 年 4 月，总税务司下发建立船钞部的通札，办理海务由海务税务司负责管理，直接对总税务司负责。其职责主要有建筑、管理沿海和内河的灯塔、浮标、雾角等航行标志，拆除航道的沉没船只，修浚港口航道，管理停泊处航船的停泊，延用专门人才和分配任务等。

从 1866 年 4 月起，新上任的税务司日意格，着手对汉口航道进行筹划。他派人测量港内航道，在浅滩及沉船处设置警示船浮标，测量水位，并亲自由汉口乘船沿江而下，



航标灯船

对长江巷道进行实际考察，先后在长江中下游设置灯船、浮筒、标桩等航道设施。据《海关十年报告 1882—1891》（江汉关）所载，1882 年航标灯首次在汉口周边出现，位于黄石港下 1.5 英里处，灯为红色，用以指导船只绕开暗礁。

汉口进出口贸易日益兴盛，中外船只穿梭不绝，江汉关逐步加强对长江航道的管理。1891 年，已在武昌府、黄州府等地设置灯塔 10 座。1900 年，在下游设置灯船 41 处、浮筒 18 具、标桩 6 具。1901 年，在下游添设灯船 11 处，次年装置了瓦斯灯浮。1903 年，又在长江口设置浮标 11 具，逐年完善航道设施。

1906 年，江汉关在九江设置巡江司，配备巡江段长、江务帮办等，专司测量船艇、水道、设置水尺，印发航船布告、水道水量通告，检查沿江标志和各处灯台、灯站，引导船舶安全航行等事宜。

1923 年开始发布长江中下游《航道布告》，公布标志异动、航道情况和航行规定，发布水位公告，对航标进行持续维护。同时发放海图，1931 年至 1937 年发放达 3.3 万余份。

1930 年，开始用铁灯船取代木灯船，

沿线共有灯 157 盏，浮筒 59 具，标桩 377 具，形成较为完善的航道基础设施。到抗战爆发前，拥有 29 艘大大小小的测量船，管辖范围上至宜昌，下达通州。到 1948 年初，拥有“海济”“湘益”“引洪”“峡安”四艘巡轮，往返于长江之上的各个航标设施之间。



江汉关“湘益”号巡轮

1915 年和 1920 年，根据长江航道地理形势，江汉关分设巡江事务处。1923 年，中、下游巡江事务处合并，在汉口成立中下游巡江事务局。到 1929 年 11 月，中下游的巡江员一律集中列入江汉关工资名册，至此形成了江汉关内部具有半独立性质的长江航道管理体系，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1949 年，长江中下游巡江事务局改为江汉关江务科。根据 1950 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江汉关所有灯塔、浮标等助航设备、工作人员、物资、器材全部移交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江汉关不再负责武汉水域的航道管理。



巡查长江浮标

引水机密为日寇侵略利用

引水，旧称领港、领江等，是港口业务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项目，一般都是由熟悉航道并具有驾驶经验的专业人员，引领或驾驶船舶进出港口，或在江、河、内海一定区域内航行。世界各国历来都由本国人担任引水职责，因为港口的险要、航道的深浅等关系到国防机密，外国船只如果没有本国引水员的引领，不许自由进出，这就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强制引水”制度。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引水制度比较健全，外国商船没有中国引水员的带领，是不能自由进出广州港的。自1843年中英签订《五口通商章程》起，中国的引水权就开始被侵略者一步步蓄意破坏，外国领事馆擅自办理引水执照，外籍引水人渗透中国引水队伍，中国各口岸的引水权被逐步蚕食。

1867年至1868年，中国江海各口引水人共203人，其中华人103人，其余是英、美、荷等外籍人员。尽管外籍不到一半，但大多在重要水域任职。

1869年，总税务司署将《中国引水总章》

10款发到江汉关，将引水监督权明文划归江汉关管辖。从此，中国的海防、江防门户洞开，汉口长江航道的引水长期被江汉关牢牢控制。

1905年，根据修订的《上海引水章程》，江汉关的引水界限、引水人和引水费用等，由被外籍人操纵的理船厅、各国领事馆和通商总局协同拟订，引水人的招募对象须来自华人和与中国结有条约的国家。华人虽然可以担任江汉关引水职务，但其选用、考核、发证却被江汉关税务司所掌握。而且，外国保险公司所收保险费，对用外籍人引水的商船较低，对用华人引水的则高出许多，甚至还不予投保。这样一来，中国政府还是未能掌握引水的实权。

20世纪初，洋人多以“不懂现代轮船知识，不能操纵海轮”为借口，阻止华人加入引水组织，引水业务基本上被外籍人垄断。从上海到汉口的航线上，一些外国引水行业组织占据了引水市场，如上海引水公会、淞汉（上海至武汉）引水公会、日本扬子江引水公会等，公开排斥华人，长江入海口甚至“无一华人充当引水”。

1910年，湖北轮船服务工会成立，受汉口市商会领导，这也是由引水员、舵工、水手等组成的第一个武汉引航水组织。

1926年，在长江干流从事引水业务的引水人有190人，华人86人，外籍人104人。二者收入极其悬殊，外籍人工资总额104万元，华人工资总额只有20余万元。1927年，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汉口分会将汉口失业引水人组织起来，成立引水支部。到1934年，在汉口以上地区从事引水业务者共有513人，其中汉口161人、宜昌126人、重庆226人。

长江引水权的丧失，导致长江航道的水文资料等机密被外籍引水员掌握，给抗战时期的武汉会战带来灾难性的影响。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后，日军军舰就在淞汉引水公会的日籍引水员和英美等外籍引水员引领下进入长江，冲破江阴和马当封锁线，直逼武汉。

国民政府一直试图将引航业和引航管理权收归国有，1933年颁布《引水管理暂行章程》，设立引水管理委员会，对各口引水组织划分、引水界线、引水员资格均有明确规定，并命令“各口已有引水执照之人重新登记”，《中国引水总章》才正式废止。但引水事务的实际管理权依然被海关操纵，外籍引水人依然在引水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1938年7月18日，江汉关正式成立汉宜湘区引水委员会，专门引领200吨以上的轮船。国民政府军令部、交通部、商会代表等与会，由江汉关税务司安斯尔和巡江事务长柯斐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参加，江汉关控制引水业务未能改变。

武汉沦陷前夕，在国共两党的主导和汉宜湘区引水公会、中华海员工会汉口分会领江支部及扬子江同益引水公会的协助下，长江中游的全部引水员连同眷属在内达2000人以上，安全撤退到万县和重庆，中断引水工作。撤退过程中，有5名汉口引水员被敌人捕获关押，他们深明大义不为敌用，保持了高尚的气节。

抗战胜利后，全国引水管理委员会成立。国民政府于1945年8月28日颁布《引水法》，翌年2月颁布引水人员登记办法，截至9月底，经登记检核的引水人员共248人，其中汉宜湘引水公会177人、中华海员



1946年6月行政院指令战时引水管理仍暂由海关办理

工会汉口分会领江支部61人、扬子江同益引水公会10人。根据1946年6月行政院指令，战后引水管理仍暂由海关办理。

1947年，引航管理事务收归交通部航政机关，江汉关等海关各口开始向国民政府移交引水管理权，外籍引水人逐步淘汰，外国势力控制中国引水业的局面才得以根本改变。

气象观测报告送往香港

1869年11月，总税务司赫德向全国各口海关发出第28号通札，要求各海关建立气象观测站。

接到通札后，江汉关立即着手办理气象观测站的选址、筹建工作，将气象观测业务附属于监察课，由监察长兼港务长负责，观测工作由值班外勤人员兼任，主要观测汉口港24小时的涨落和日最高、最低气温，24小时风向风力和气压、湿度、降雨及降雨量等。1903年11月，又增加了干球和湿球温度、云状、云量等项目。

1897年，江汉关每天向上海徐家汇天

文台及香港天文台发送两次气象资料的电报，对航运船只了解气象规律起到了一定作用。1903年6月27日，江汉关税务司斌尔钦在致巡江司的备忘录中，有关于口岸气象报告每月送往香港和徐家汇的记录。1916年10月，气象电报资料加送中央观象台、农商部观测所各一份。

江汉关气象观测曾经为抗战服务。1938年4月12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密电江汉关电台，要求江汉关收集芜湖、镇江、上海、青岛、塘沽、秦皇岛等各关的气象资料，以密电码报告航委会第一测候所备用，及时为中国军队提供气象资料。

江汉关气象观测场原设于汉口河街海关旧址，1923年1月21日迁移到怡和轮船公司下码头附近的草坪上。此处面对大江，周围没有树木，特别适合气象观测，可以取得较准确的气象和温度记录。

1924年江汉关大楼建成后，气象测候工作安置在大楼内，建有百叶窗、雨量器、风向仪等设施。抗日战争时期，江汉关大楼

被日军占领，气象观测被迫迁至原汇丰银行大楼平台上。日本投降后，气象观测又迁回江汉关内。

新中国成立后，江汉关所有气象观测仪器及气象资料移交给长江航运管理局港务处收存，不再监管气象业务。

邮政范围向内地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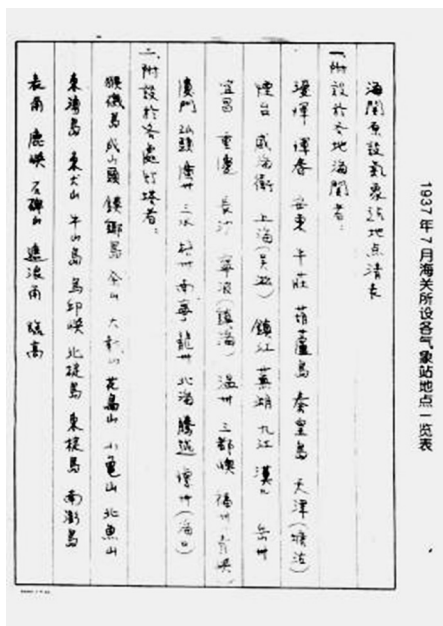
1861年汉口开埠后，英、俄、法、德、日等国先后在汉口租界开办邮局，称为“客邮”，收寄侨民邮件。1866年，江汉关设立邮务办事处，开始兼理邮政业务，仅为各领事馆及江汉关来往于京沪间的文件传递之用。到1869年，长江上每月常有轮船下驶，邮递交江汉关加封转递。

1878年12月19日，江汉关税务司惠达创办汉口邮政分局，指派洋关员打理，这也是近代武汉的第一家邮局。邮政业务量开始扩大，除了代递公文，普通市民的信件也可以投递，经营模式一概仿照西欧各国邮政。服务项目主要有信函、报刊和贸易契，还可办理挂号和投递国际信函业务，并发行邮票。

邮政试办之后，弊端百出，通商各埠客邮泛滥，光绪皇帝终于在 1896 年谕允开办大清邮政管局，翌年 2 月正式成立，推广海关邮递，与各国联邮，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但仍依托于海关办理。总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政司，总署设立邮政总办，由总署造册处税务司兼任。

根据《大清邮政开办章程》，汉口为全国35个邮界之一。1897年2月20日，在汉口河街成立汉口邮政总局。

江汉关在汉口邮政总局包裹房设立海关办事处，办理包裹验估收税及查私等业



1937 年 7 月海关所设各气象站地点一览表



1911年汉口邮政局关防

务，邮务长之职由外籍人员兼任。邮递业务分为通商口岸相互往来寄递、通商口岸往来内地寄递、通商口岸往来外国寄递三种，服务项目增加了明信片、包裹、邮政汇兑等，并对所有邮资作出详细规定，并于1898年8月首次印发明信片。

随着邮政业务的发展，江汉关先后增设了武昌、沙市、宜昌、武穴等二等支局，后来又在汉口、武昌、汉阳、武穴、新堤、孝感、广水、黄石港、蕲州、黄州及河南信阳、遂平、许州、郑州等地设立三等支局，形成庞大的邮路网络。

1902年，为增设孝感及河南信阳等处支局，江汉关遇到一些阻力。税务司卢力飞派洋员和供事前往办理，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配合。两位总督联名通电北京军机处，认为江汉关只能在通商口岸设邮政局，在内地设局极为不妥，力阻其事。后来由于总税务司赫德插手，懦弱无能的清廷只能听之任之，江汉关邮政管理的范围不

断扩大，连陕西西安、宜昌、沙市以及长沙、岳州等地邮政都归其管辖。

1906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设置邮政司专管邮政事宜，在汉口邮政总局专设邮务总办，开始收回邮政管理权。尽管如此，赫德仍不愿罢手，一直拖延到1911年5月28日，才正式向清廷邮传部办理移交手续，邮政总办离开海关总署。江汉关与全国各口海关一样，监管中国邮政事务的使命从此终结。

检疫完全由英国人操纵

1873年，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流行霍乱，中国上海、厦门等地也被感染。意识到海港检疫的重要性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进出口船只的检疫工作，防止人与动物等各种疫病的传入和散布。

汉口对外进出口货物开始检疫始于1902年，由江汉关管理并制定检疫规则。1904年7月25日，江汉关发布《江汉口防护染疫章程》17条，主要是针对通过长江水路驶来武汉的各种船只、人员，对染疫及可疑船只上的旅客、物品的处理均有详细办法。

根据《江汉口防护染疫章程》要求，中国沿海各口或外国各口驶来汉口的海船，进入长江之前，须先经过吴淞崇宝沙防疫医院查验，并遵照上海、吴淞两口防疫章程办理。若查出船上人员有痒子瘟等可疑之病，须就近送到吴淞崇宝沙防疫医院治疗，该船不得放入长江。对来武汉水域的海船的检疫管理甚为严格，若没有染病之人，即准许进口，进口前要在船的前桅杆上悬挂黄色旗帜，并在口界之外停候，得到理船厅允许才能进口。该船领有准单的人可以上下船只，

没有领准单的人则不能下船，没得到允许，不准装卸货物和行李。如果发现染疫或疑似病者，须立即上报理船厅，由医员定夺，并令该船移泊在口界之外进行药物熏洗。凡从有痒子瘟之口来的船只，所有货物一律不准运进本口。

江汉关雇请了一名英国开业医生，每当有轮船载有染疫之人或死者进口时，即登船办理检疫，检疫权完全操于英国人之手。

1926年，武汉地区设立汉口卫生局，试图插手由江汉关掌管的检疫事务。汉口市临时市政会议通过《汉口市江岸检疫暂行规则》，与江汉关会商，但为了不与海关条例发生抵触，不得已放慢控制长江检疫的脚步，暂不派人对进出口船只进行检疫。

1929年通过交涉，国民政府卫生部终于接收海港检疫的管理事务，并颁发海关检疫章程和海关检疫所组织章程，检疫工作交由武汉检疫所办理。当年，上海、南京等地霍乱流行，武汉检疫所组建临时防疫队，在太古、三北、招商局、日清等轮船公司码头进行检疫。

1949年6月13日，即武汉解放不到一个月，武汉市防疫委员会成立，武汉的检疫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江汉关除上述非海关业务，一度还掌握了对进出口船只、进出口货物、旅客行李等业务的管理，甚至越俎代庖，连中国参加世博会的事也要代管承办。由于参加世博会涉及大清国的外交脸面，国人也日益觉醒，



浮筒上的检疫轮船

1905年要求收回自1873年起就被洋人把持的承办权。清政府迫于民间舆论压力，意识到泱泱大清不能事事假手于人，终于同意将世博会承办权收回，随即制定《出洋赛会通行简章》20条，对会场管理、赴会申请、商品免税等多个事项作出了规定。自1905年比利时黎业斯博览会后，中国参加世博会改由清政府承办，海关只参与其中部分工作。

李笙清，武汉博物馆文博馆员

武昌“游乐大街”民主路

◇ 方东平

清末，美国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多次游览考察武昌城的蛇山、长街、民主路及昙华林街区，在他的《中国十八省府·武昌》一书中写道：“在蛇山西端一个叫花山的地方，有一座漂亮的三层塔（指胜像宝塔），让我们想起西藏的圣骨冢。城市现代脊柱（指蛇山）的北面，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街，街上有 7000 多家店铺，堪称武昌的百老汇。”

百老汇本是美国纽约的一条大街，其历史可追溯到 19 世纪初期，是闻名世界的戏剧、艺术和娱乐业的活动中心。武昌旧城民主路这条大街，亦是全城的游乐场所，其繁华热闹的场面不亚于百老汇。

武昌第一条现代大马路

民主路位于蛇山之北，东西走向，西起汉阳门江边，东接中南路北段，全长 4122 米，为武昌交通干道。汉阳门有轮渡可到汉阳、汉口，在司门口与长街（今解放路）相交，在胭脂路与武昌路相交，在小东门与中山路相交，武黄铁路从小东门跨线桥通过。

民主路曾为四条路，且各有路名：汉阳门江边到司门口，名为汉阳门正街；司门口到横街头，名为察院坡；横街头到胭脂路，名为抚院街；胭脂路口到民主路 482 号（结核病防治所），名为龙神庙街。1935



民国初期的武昌江畔一带

年，上述四条路串通扩建，命名为胡林翼路。胡林翼在清末曾任湖北巡抚，因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因此武汉解放后改名为民主路。

民主路地处武昌城中部，历史上它是唯一贯通武昌水陆两个城门（汉阳门到忠孝门）的大街，因而是武昌的闹市中心。自宋代起，蛇山北一带是密集的万家民房，南来北往的人摩肩接踵。古黄鹤楼在汉阳门西面，游人如织，因此汉阳门正街亦是一条最繁华的街道。司门口与长街十字交叉处是宋代岳飞的鄂王府，明代为布政使司衙门，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第一次占据武昌城时，成为杨秀清的东王府，后为著名的私人花园“憩园”。清武昌官府曾在汉阳门内（今民主路小学西侧）。清末察院坡一段，新旧书业集中，形成三镇最早的文化街。

民主路是武昌历史上第一条现代大马路。20世纪20年代初，武昌城墙坍塌多处，缺口处也成为“通道”。汉阳门是最低矮的，但过往行人最多，城西的居民都要经汉阳门去江边挑水。行人（乘船上下的人居多）、人力车、挑夫在城门洞里争相夺路，拥挤不

堪。门洞内长年泥水淤积如水田一般，过往行人叫苦不迭。1925年石瑛（字蕲青）任武昌大学校长时，邀请吴稚晖、胡适、马寅初等来校讲学，他们经过汉阳门时极不方便。吴稚晖提着衣襟和裤脚笑道：“蕲青，为何叫我钻‘狗洞’？”

早在1919年，湖北省议会有62人提出拆武昌城墙的议案，理由是为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但遭到许多人反对。自那时起，拆与不拆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

1926年10月，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终于作出拆除武昌城垣的决定，修建包括汉阳门在内的8条进出城区的道路。但拆除汉阳门修建大马路时，由于居民笃信风水不愿拆迁而遇到麻烦。此时身为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亲自出马，挨家挨户动员拆迁：大家相信风水，这是从老辈人那里传下来的，也没有什么对错可说的。我要说的是，所谓“风水宝地”，能自己长出稻米来吗？所谓风水好的店铺，不用心经营就能发财吗？糠能变成米吗？还是得靠人用心操持。等大马路修好了，人气旺了，你们的生意就好做了。如果讲风水，这才是你们的好风水。这番话让人们眉开眼笑，特别是大家知道他是省建设厅厅长“石老头子”之后更为感动，都很快搬了家。

石瑛主持修建了民主路，一条商业繁华之路，一条闹市游乐之路。

武昌民间演艺的“热闹窝子”

民主路一带是武昌著名的娱乐场所。美国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之所以将蛇



1935 年的胡林翼路（今民主路）

山称为“花山”，亦是指以汉阳门临江黄鹤矶头黄鹤楼为圆心的一带，是一处浑然天成的游览娱乐场所。

黄鹤楼虽自光绪十年（1884 年）火毁后仅存遗址，但胜像宝塔、涌月台、吕祖阁、禹碑亭、古碑廊等名胜古迹仍存，黄鹤楼遗址亦是人们登高揽胜和休闲活动的好场所。黄鹤楼遗址及附近空场有三多：民间艺人多、打卦算命的多、小吃摊点多。由于民间艺人汇集，茶馆应运而生，最著名的有品江茶楼、黄鹤楼茶社、象棋茶棚等，被称为“民众娱乐宫”。

自唐代以来，历代名人登临黄鹤楼，行吟作歌。李白有“黄鹤楼中吹玉笛”，

刘禹锡有“曾将黄鹤楼上吹，一声占尽秋江月。”郑东华（清末江夏官员）有“轰轰烈烈汉阳门”“黄会馆，听瑶琴”“何方歌舞闹盈盈”等诗句，反映了吹、奏、弹、舞的场景。在黄鹤楼四周的空场上，许多艺人“撂地”献艺，种类有湖北评书、小曲、渔鼓、三棒鼓、相声、戏剧、武术、杂耍、棋弈等。

提起棋弈，自古流传一段有趣传说，相传一位棋手开了一家弈棋斋，棋术不错，傲气十足。

一日，有老者牵一头毛驴来与斋主对弈，斋主见是乡下打扮有些不快，挥手让他走开，岂料老者执意要与斋主比个输赢。斋主敲着棋子道：“你要真想下，也可以，我输了给你五两银子，要是你输了呢？”老汉道：“就依了你，我输了便把毛驴给你如何？”斋主点头同意，又说：“我的弈棋斋有个规矩，南来的我让车，北来的我让马，听口音你是北方人，就让你一马吧。”说罢二人楚河汉界杀将起来，不到二十回合，老汉输了棋，于是道声“领教”便留下毛驴走了。

不料次日，老汉又来了，肩上还多了条褡裢，对斋主笑道：“昨日蒙教，今天我又拿来 50 贯钱，还想下一盘。输了我把钱留下，赢了我牵毛驴走。”斋主点头同意，又准备让马，老汉却说：“不必了，输要输得光彩。”双方遂摆子对弈。又是二十个回合，斋主便败下阵来。老汉道“昨日我有事，骑驴不方便，谢谢你给我驴饮水喂料”，随后骑驴飘然而去。斋主半天才回过神来，方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再也不夸海口了。

这里声名远播，外地民间艺人也纷至沓来，各类特色演艺通俗易懂，观赏性和娱乐性强，从早到晚人流熙熙攘攘，被武汉人称为“热闹窝子”。

武汉三大文化街之一

据历史文献记载，明清两代的湖北巡抚、藩署、盐署、武昌府衙及藩照厅、藩经厅、藩库厅等，都设在民主路一带。鄂地官员进城，京城官员来鄂，大都经过这里，送往迎来应酬交际，自然带火了商机。司门口周边，酒楼、茶馆、店铺（礼品、烟酒）、旅馆、澡堂、戏院等铺满整条街。蛇山上的南楼、黄鹤楼茶园（辛亥革命后称共和大舞台，既黄鹤楼剧场），成为官宦游宴娱乐之所。

到清末，司门口北有户部巷小吃店，东有青龙巷扎彩店（专供娶亲迎新之用的花轿及唢呐、铜管等），西有鼓楼洞附近的翠丰巷、新街古玩珠宝市场，南有横街头文化街，商机火爆，观者如织，据说曾与北京的琉璃厂齐名。

横街头至察院坡一带是闻名的文化街，为旧武汉三条文化街之一（另两条为汉口交通路和华商街），仅书店鼎盛时就达32处。1920年2月1日，恽代英在横街头18号创办“利群书社”，在介绍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唤醒民众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清末科举未废时，城内设有举行全省乡试的贡院。为适应考生的需求和那些进士出身官员的文化消费需要，加上武昌古城书院及新学堂的兴办，古旧书业出现空前的繁荣，聚集了众多经营古旧书刊、文献典籍、文房四宝、传统书画、碑帖尺牍、历史年画及古玩的店铺，最盛时达30余家。最著名的是亚新地学社，编印的地图行销海内外。有的书店出售评弹鼓词、戏曲唱本、绣像小说，最受艺人青睐，成为他们献艺的脚本和再创作的重要参考依据。街东段的殡葬用品



利群书社旧址

店铺等，亦形成规模经营。凡此种种，均凸显了鲜明的文化服务特色。

武汉解放后，民主路依然古风弥漫，文化氛围浓厚，特别是黄鹤楼旧址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沿江地区和大桥纪念碑一带，每天各类演艺班子圈地演出，专业剧团演员和戏曲爱好者竞相表演。看戏听歌的观众少则千余人，多则二千余人，加上沿江数十家固定的歌厅场所，可以说不减当年武昌城“百老汇”之风貌。

方东平，曾任武汉市汉阳区史志办主任，现为武汉市地方志专家库成员

汉阳泗湾：《革命家庭》的故事发生地

◇ 侯红志

1961年，著名演员孙道临、于蓝、于洋主演的电影《革命家庭》在全国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在新中国初期出生的一代人脑海中，《革命家庭》反映的大革命岁月难以磨灭。

《革命家庭》由夏衍依据《我的一家》改编，《我的一家》则由革命先辈陶承

（1893—1986）依据大革命时期的经历口述成篇，而她当年的家就在汉阳龟山东麓的泗湾村一栋两层楼的木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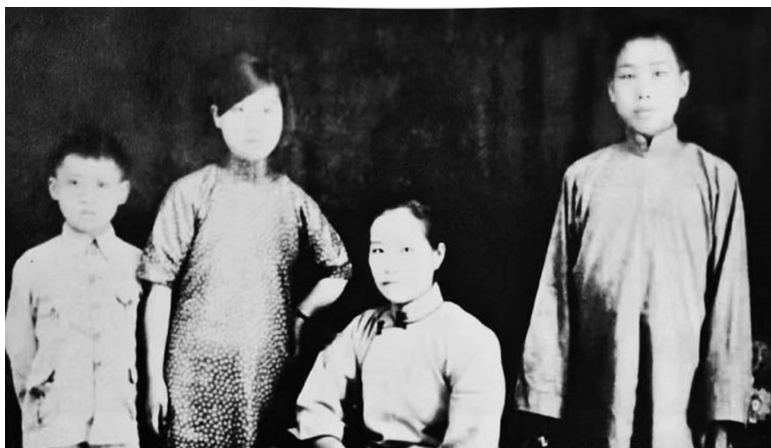
历史划过近百年，泗湾村早已物是人非。据《汉阳地名丛谈》记载：“泗湾村在龟山脚下，莲花湖畔，这里雨季多渍水，故名泗湾。解放前这一带多为棚户木屋，贫苦百姓居于此或经营菜地，或从事手工业为生。泗湾村1967年曾改名桥头村，1972年复名。”至今，泗湾早已被大片现代建筑（其中包括1954年建成的大桥局办公大楼）所覆盖，“棚户木屋”已难寻蛛丝马迹，陶承的那个家亦消失于无形。

泗湾设立中共汉阳县委机关

1911年，陶承嫁给了重病在身、急等结婚冲喜的长沙第一师范学生欧阳梅生。欧



陶承晚年和少年儿童在一起（网络图片）



1932年，陶承（左三）与三个孩子合影（《汉阳百年影像》）

阳梅生求学长沙时，与毛泽东是校友，与蔡和森是同班同学。1926年初，欧阳梅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受党组织派遣到武汉开展工作，几经周折，将据点选择在汉阳泗湾村。这里背靠龟山，如遇紧急情况便于疏散。

1928年1月底，湖北省委改组汉阳县委，由张浩（林育英）任县委书记、欧阳梅生任组织部长。县委机关就设在欧阳梅生家中，经常在此活动的还有湖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秘书长黄五一和汉阳县委的龙大道等。这座房子的女主人陶承就成了机关的掩护人，长子欧阳立安十几岁时也就成了机关小交通员，这在电影《革命家庭》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27与1928年之交（即旧历年关之际），湖北省委组织年关暴动，试图一举占领武汉这样的中心城市。据《武汉通史》记载：“由于（湖北）省委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对国民党屠杀暴行的仇恨以及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怒情绪而滋长起来的急躁情绪，冒险地部署了年关暴动。据亲历其事的张金保说：‘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主张利用宁、汉战争之机，在武汉举行武装起义，

即使组织一两天苏维埃也是好的。我参加湖北省委工作后，出席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宁波小学地下室研究武装起义的事。会议决定，1928年春节期间组织年关暴动，夺取武汉。’中共湖北省委在当时革命低潮中，没有冷静地估计形势，采取了冒进的行动，从各方秘密动员，组织放火队、交通队、宣传队，并以棉花厂起火为讯号，利用

旧历年关放鞭炮迎神为掩护，发动起事，夺取电灯公司、电报局，切断电线，控制交通要道，做到各厂电灯不亮、电话不响、电报不通、自来水不流。”

参加准备工作的党员和工人情绪很高，有的人把刚刚沉入水中或埋在地下的枪支取出来，有的从单独行动的敌人那里夺取枪支。欧阳梅生则从汉阳兵工厂运出20多条枪。但是，这次年关暴动准备仓促，事机不密，很快风声满播街巷。老百姓开始抢购粮食、备足饮水。接着，由于党组织的一家秘密印刷厂被查获，名单落入敌手，甚至敌人在报纸上也登出“共党暴动”消息，于是军警四出搜捕革命者。

1928年1月19日晚，省委常委、总工会秘书长黄五一参加人力车工人活动分子会议时，被敌探侦悉后捕抓，次日凌晨杀害于汉口济生三马路。汉阳县委的陈大胡子、小交通员冯长汉也被敌人杀害。此时身处汉阳的龙大道、欧阳梅生和张浩焦急万分，等待讯息。张浩在自家试制炸弹不慎爆炸，因忙于与其妻疏散老母和背送脚跛的同志转移，竟丢失刚满月的女儿。当时，在汉口宏春里、济生三马路、江汉北路、大智门、球场街和武昌阅马场、张之洞路、大东门

外，每天都有革命者喋血就义。仅仅在年关，被敌人枪杀的革命者达100多人。年关暴动败于未萌，龙大道、张浩等接到党的指示速转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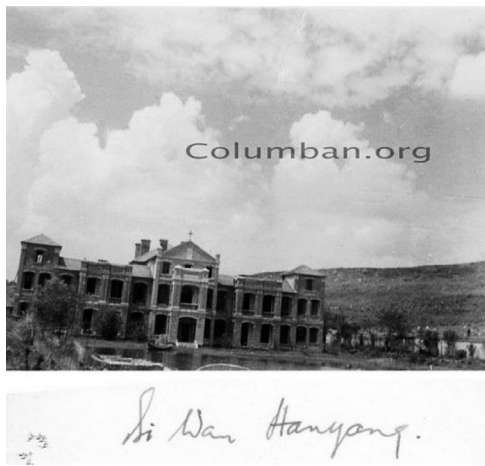
除夕这天，一直处于高度紧张、极度疲劳的欧阳梅生，仍在泗湾的机关给省委起草关于

年关暴动的报告，写到最后一页时，突然倒地昏迷不醒，等到宵禁解除送到医院已是次日中午，就这样牺牲在岗位上。陶承一家继承遗志，前赴后继，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岁月中，儿子欧阳立安、欧阳稚鹤也先后牺牲。

1956年春天，陶承应邀赴北京，口述革命家庭的感人故事。由何家栋、赵洁执笔，形成6万多字的《我的一家》，徐特立、谢觉哉为之作序，1958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一家》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心灵，



1954年左右在建的汉阳大道，大桥局侧后的泗湾天主堂清晰可见（《显正街记忆》） 泗湾天主堂历史照片，从房屋样式和结构对比，与左图建筑为同一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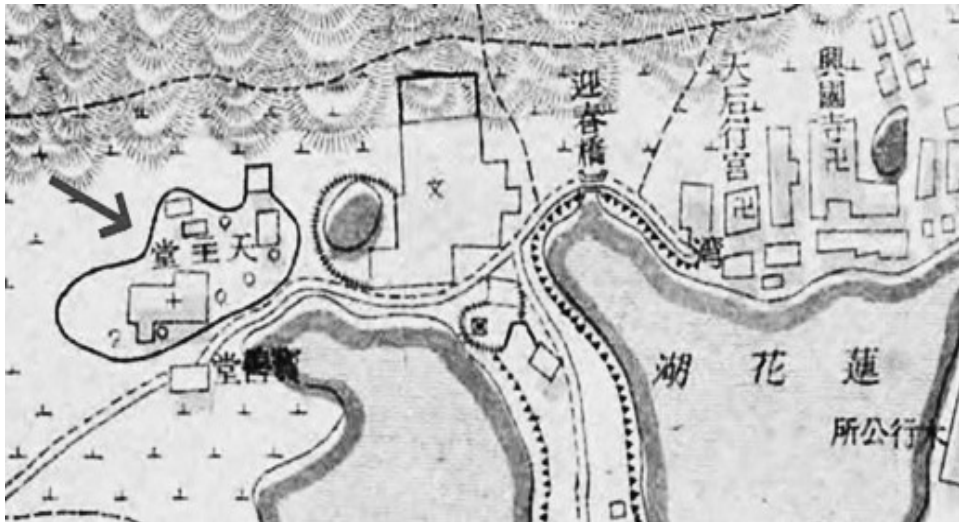
成为一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改编成电影《革命家庭》后更是家喻户晓。

泗湾遗存天主教堂

笔者近日在麻建雄主编的《显正街记忆》一书中，发现一幅摄于1954年左右反映汉阳大道建设的老照片，道路一侧的大桥局大楼已建成。细看大楼侧后方有一群西式建筑，经与历史图片比对，应为老汉阳的泗湾高隆庞会会院，

亦称“泗湾天主堂”，也有资料称“高隆庞会主教府”。之所以称这幅照片拍摄于1954年左右，是因为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在此建大桥局大楼。

有关泗湾天主堂，《汉阳地名丛谈》中俞汉



《武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上的泗湾天主堂



泗湾天主堂旧址主楼，现为弘桥小学教学楼（韩少斌供图）



泗湾天主堂旧址现存全貌（王汗吾供图）

民和刘汉英的文章有如下描述：“泗湾在民国年间还曾修建过一座天主教堂。1920年11月爱尔兰人爱德华·高尔文在汉阳龟山之麓购得三栋房屋，并将其改建为教堂，另建神职人员住宅、台球室和酒吧等。每年夏天，高尔文亦到泗湾天主堂处避暑。”

从1930年的武汉老地图上看，泗湾天主堂不止一座建筑，应该是一处高隆庞会汉阳教区主教府建筑群。

2024年12月17日，笔者以《汉阳泗湾天主堂1954年还在》为题，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第二天即有人相继发来两张这座天主堂建筑的现存照片，表明泗湾天主堂建筑不仅1954年存在，现在还存在。

这两张照片，一张是泗湾天主堂原建筑的主楼，另一张是现存建筑全貌。天主堂旧址建筑现为汉阳区弘桥小学教学楼，主楼上镶有“启智楼”三字。弘桥小学始建于1954年，原是大桥局的一所子弟小学，校名为汉阳铁一小，2006年3月1日移交汉阳区。

泗湾天主堂是一处建筑群，主要由石材构成，坚固耐用，顺理成章成为大桥局子弟小学，因而保留下来了。当年的泗湾，是个只有33户人家的小村庄，多为茅屋，悉数拆除。

一位名“聪慧洞”的读者还在公众号留言：“按图所示，泗湾天主堂所处位置不在大桥局机构院内，是在现弘桥小学院内，右边箭头所示那个屋顶还在，就是小学操场西边那栋楼，操场中间曾保存着一栋四方楼，1960年代拆除。”

泗湾天主堂建于1920年，汉阳县委1927年底至1928年初在泗湾开展革命活动，周边布满了革命足迹。欧阳梅生在此地牺牲，黄五一、龙大道分别于1928年、1931年被反动派枪杀。张浩（林育英）1928年撤离此地后4月赴安源，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33年1月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等职。1938年初因病调回延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2年3月6日在延安逝世。在公祭仪式上，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为之执绋抬棺，毛泽东亲献“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挽辞。

侯红志，原武汉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